



# 2021 台灣新聞自由年報



發行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發行人：鄭超文

主編：李志德、曾俐璋

執行編輯：曾俐璋

排版設計：許瀚月

封面設計：許瀚月

製版印刷：美藝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售價：新臺幣 180 元整

初版：2022 年 9 月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會長：鄭超文

常務委員：李志德、吳柏軒

執行委員：安德毅、黃以敬、游婉琪、  
楊智強、賴昀、羅玉潔

常務監委：林注強

監察委員：涂建豐、黃子明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 88 號 6 樓

電話：(02)2341-0044

捐款帳號：

台灣銀行 (004) 054-001050713

戶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封面攝影：劉致昕

# 講客，不只是客家人的事



為落實國家尊重多元文化之精神，促進國家語言之傳承、復振及發展，《國家語言發展法》第4條規定，國家語言一律平等，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客家基本法》第3條亦規定，人民以客語作為學習語言、接近使用公共服務及傳播資源等權利，應予保障。囿於歷史環境等因素，目前使用客語的人口正快速流失，事實上，全國有近20%客家人口，推廣客語並非只是公部門的責任，客家委員會鼓勵多元企業在從事商業行為時，能夠主動融入客家語言及文化，並將客語列入企業社會責任(CSR)及企業永續目標(ESG)之一，期能打造一個多語平等的社會。

# 聽得多一種聲音 佇偈生活日常



第一次坐車聽到報站的客語，不知道有多感動。不知不覺，越來越多地方也開始說起客語。轉帳的時候，看醫生的時候，每晚看電視的時候，期待未來的日子到處說客語，將會是這麼自然的事，無論做什麼事情開始，都會想起你我身邊，五個人就有一位客家人。

坐電扶梯個時節愛企好，手也愛扳好勢來。下一站台北車站，愛去淡水个旅客，請在本站盤車。

第一擺坐車聽到報站講客，實在分人盡感動。

毋多知仔，這下盡來盡多位所也接等講客起來。

ATM轉帳個時節、去醫院尋先生個時節；逐日暗晡看電視個時節。

希望未來个生活滿哪仔講客會係盡自然毋過个事情，做麼个起勢都會想到，佢兜身邊，五儕人就有一儕客家人。



## 會長的話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連續幾年在國際記者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贊助下執行「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2021年舉辦了三場講座活動，勞動權益的講座佔了其中兩場，另外一場才是新聞專業的講座，為何勞動權益的比重超過新聞專業，我們可以從國際記者聯盟的成立宗旨來看，國際記者聯盟是世界最大的國際性記者組織，其主要目的在於保護與強化記者的人權與自由。但是最重要的，IFJ的成員是各國的記者工會，記協在與IFJ合作的過程中，讓我們深切地體認到，新聞自由必須建立在記者堅實的勞動權益上。

但是在連續幾年問卷調查及講座上，記協發現台灣新聞從業人員連勞動法律的ABC都不太了解，以至於發生了有媒體主管在記者主張「退避權」拒絕前往烏克蘭戰區採訪，因為媒體機構沒有提供記者基本的訓練、保險及後勤支援，結果記者竟然遭到長官要求賠款及懲處的誇張事件。

記協在資深會員余佳璋及多位前輩的長期耕耘下，一直與IFJ維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余佳璋更曾經擔任IFJ的幹部，所以當台灣同業要前往過去幾乎不曾去過的波蘭與烏克蘭等戰區採訪時，記協緊急放寬「國際記者證」申請的門檻，讓同業能持著IFJ的「國際記者證」前往當地採訪。

今年記協派出理事游婉琪前往阿曼參加2022年國際記者聯盟(IFJ)第31屆會員大會，代表台灣參

加第31屆IFJ執行委員會選舉，並入選為後備執行委員(General Reserve Advisers)。

在今年的自由年報中，最受注目的新聞事件，甚至以震動全球形容都不為過的，是2022年2月24日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不少台灣新聞媒體投入大量資源，派遣記者到前線，力求呈現戰爭前線的真實面貌。這樣的嘗試是不是成功？實際前往第一線的記者同業遭遇哪些困難？獲得怎麼樣的經驗？年報邀請了TVBS記者劉亭廷、中央社鍾佑貞和林行健，以及報導者楊智強。以三篇追記，總結、反思採訪俄烏戰爭的經歷。

另一方面，在台灣，延任957天的公廣集團第六屆董事會終於在幾乎要打破延任紀錄之前，第七屆董事會總算組成。換屆後的公廣集團，面對了什麼樣的挑戰？這是本期第二個專題：公廣前進的方向何在？兩篇專論，曾任董事的邱家宜綜論公廣未竟的革命；另一篇則聚焦談公廣集團新聞服務豐滿的理想和骨感的現實。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會長

鄭超文

# 清晨夜間更要閃亮登場

## 外出請穿戴亮色衣物或配件

# SHINY

# BRIGHT

# SAFETY

### 路口慢看停 / 行人停看聽



交通部道安會



高雄市政府新聞局

廣告

2021 台灣新聞自由年報

目錄

00 會長的話

■ 挺進前線：衝突區的記者採訪手記 01

02 第一線直擊烏俄衝突：22 天歐洲採訪後記 | 劉亭廷

15 前進烏克蘭側記  
記者見證民眾戰火下誓不屈服 採訪證一度被標成中國 | 鍾佑貞、林行建

20 隱形的新聞戰士 — 與記者和特派員出生入死的 Fixer | 鄭佩珊

■ 風雨前行：台灣公廣集團的未來進行式 23

24 有待來者的長遠革命—期許台灣公廣集團 | 邱家宜

26 公廣的新聞服務何去何從？ | 李志德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活動紀要 33

34 2021 記協校園媒體識讀講座系列活動

36 2021 記協培養優質公民力—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

38 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利觀測計畫

- 「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系列講座

- 2021 年台灣媒體工作者勞動權利暨錯假訊息影響調查結果分析

- 成果發佈會新聞稿

52 2022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一次會員大會

54 2022IFJ 國際記者聯盟阿曼年會

■ 年報特刊 57

參與記協活動系列報導 | 卓越新聞電子報

58 記者勞動同樣有價！「受雇主監督指揮、拘束時間」即享勞工保障 | 陳曦

62 要保障還是彈性？記者工作型態多樣又特殊，勞動權益如何維護？ | 陳曦

65 在媒體速食化的年代 談「非虛構寫作」 | 陳洧農



# 臺南四百年 徵件開始

視覺識別系統應用計畫

收件時間 / 徵件類別

即日起 - 2022.9.12

空間布置

即日起 - 2022.12.31

商品開發  
創意提案

相關計畫內容可掃描下方QR CODE下載簡章。



報名收件Email | tn400cab@gmail.com

聯絡電話 | 06-214-9510 #21 | 徐先生 |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文創發展科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官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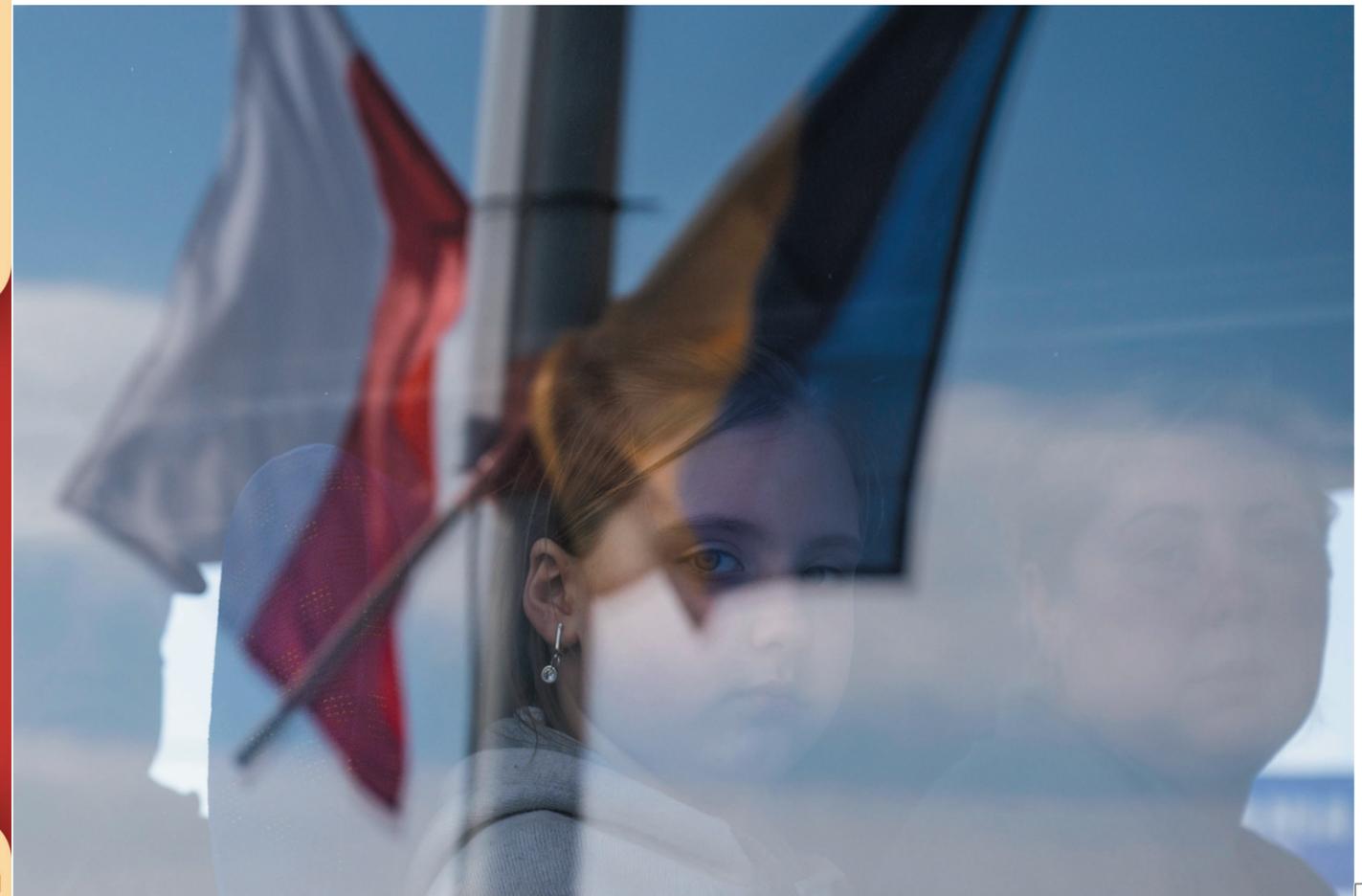
文創Plus 臺南創意中心



臺南市政府 廣告

攝影：楊子磊

## 挺進前線：衝突區的記者採訪手記





## 第一線直擊俄烏衝突： 22天歐洲採訪後記

TVBS 記者劉亭廷（右）、洪復華（左）挺進波蘭採訪俄烏衝突。（圖：劉亭廷提供）

### 劉亭廷 / 《TVBS》記者

22天的歐洲採訪終於劃下句點。一個人在防疫旅館隔離的這幾天，好不容易得以喘口氣，也有時間好好整理將近一個月的馬不停蹄。想起來，單單是出發前的準備真的挑戰所有人的心臟——如何在48小時內把自己塞上飛歐洲的飛機。

時間回到2022年3月10日傍晚，烏俄戰爭正如火如荼之際，我剛下班，正要拿車，忽然長官傳訊：「公司考慮派人去波蘭、妳的意願？」我不假思索，立即回訊：「要」。

到達採訪現場，為觀眾取得第一手的新聞資訊、畫面，是記者的天職，更何況有幸見證歷史，心下當然是義不容辭，不過在疫情和戰情糾結不清之下，波蘭可不是說去就去，光是前行準備就令人頭痛。

長官與我討論，首要任務是要在波蘭找到合適的 fixer，意即需要一位非常熟悉當地、負責「排除障礙的協調者」。很多外媒深入異國，都會聘請這樣的角色作為採訪的協力者。

於是，當公司著手處理機票等事宜，我則開始狂打電話，希望能找到合適的對象。與此同時，我仍必須面對簽證確認、疫苗認證、採訪規劃等準備事項，等於是還沒有出發，已是幾近崩潰。

這樣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一般，忙活整夜，隔天一早，由於時差關係，仍無法與波蘭當地取得回覆，但前東家美聯社說一定找得到人，我才比較安心。向長官回報進度後，公司隨即定調隔天、3月12日的晚上8點40分的班機出發。

就這樣，我的烽火行程揭開序幕。

我先是找時間拜會了波蘭駐台辦事處。非常感謝波蘭駐台代表 Cyryl Kozaczewski 以及同仁花將近一個小時，聽取我的採訪規劃，給予我寶貴的意見、更不厭其煩的回答我許多基本問題（例如電信業者、匯率、語言）。他們也幫助我與波蘭外交部取得聯繫管道，讓我在當地得以順利採訪。

到了晚上，前一天發出的求援，得到愈來愈多善心人士的回覆，如前波蘭駐台代表、駐波蘭台商、旅居波蘭的學生等等。在大家的幫忙之下，我突然對接下來的採訪感到踏實了一些。果然是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很多人雪中送暖，真的讓我非常感動。

然而，警報尚未解除。時至今日，疫情肆虐的2022，為了將疫情防堵在境外，各國都想盡了辦法，出國成了一件極為複雜、繁瑣的一件事。3月11日，我一邊處理PCR（感謝新光醫院幫忙），也一邊向相關單位詢問行前到底還需要什么證明。

正當我如無頭蒼蠅一樣，四處忙的時候，感謝衛福部的天使聯絡人適時提醒我說，「數位疫苗證明」其實不等於「國際疫苗認證」。老實說，起初的反應是「驚呆了」，我實在不知該從何下手，更不知道我能不能在有限的時間內取得國際疫苗認證。但是，關關難過關關過，還是得打起精神，解決問題。

於是，百忙之中，我還得抽時間掛號，取得醫院開的中英文版正式文件。不過，難題是，得知訊息的當下已是周五下午四點鐘，我要去哪裡掛號呢？所幸有生活組長官和同事全力支援，約定好晚上八點在北醫夜間門診做認證，才有驚無險的過關。

然而，好不容易準備妥當，正信心十足踏進機場，準備出發之際，竟然又傳出意外，負責邊境的 fixer 突然打電話給我說，他剛確診 COVID-19，無法陪伴我採訪，目前正在尋求另一個朋友的幫忙。我當下也傻眼，只能安慰自己說，幸好是還沒有碰到他，他就發現自己確診，否則染疫的話，後果更不堪設想。

歷經48小時的匆忙，連攝影搭檔是誰都一波三折（最後所幸是最信賴的固定搭），過程中想到到底能否及時成行，自己都沒有答案，只有兵來將擋、水來土淹，在心裡頭備好各種 PLAN A、B、C、D…… 而我的旅程現在才正要開始。

此行任務，自然是報導俄烏戰爭，但是不是要做「戰地記者」，我們在規劃時，其實就有做過討論。

作為新聞人，能到戰爭前線觀察、紀錄，相信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機會，但公司一開始態度很明確，此行採訪絕對不是為了「戰地記者」的頭銜或光環，報導方向鎖定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影響，以及國際局勢的走向，所以一早就拍板——不進烏克蘭。一來，當然是有安全考量；二來，外交部花了好大力氣把國人撤出，實在不必再給人添麻煩；三來，當下要進入烏克蘭，無疑有技術性（例如簽證）的問題。

其實，有時候不去比去的決定更為艱難，那既然不去烏克蘭，要怎麼跑出貼近戰事的觀察呢？無疑是這次採訪的一大考驗。

**抵達波蘭的第一站，我與攝影搭檔來到華沙中央火車站。**



普熱梅西爾火車站，劉亭廷遇上第一位採訪時哭泣的難民（圖：劉亭廷提供）

在此之前，華沙於我是一個歷史課本上記載的地方，過去可能經常在外電畫面上看到，但難生感觸，如今卻活生生出現在眼前，那個衝擊是很大的。尤其當你看到媽媽帶著三、四個孩子，在志工帳篷拿著三明治、日常用品、看到有烏克蘭人逃難，也不願放棄摯愛的寵物，拎著貓狗跨越邊境、還看到有小朋友在愛心帳篷挑選捐贈的玩具，又看著攝影機，天真的揮揮手，你很難不湧生情緒，體悟到戰爭的殘酷。

在華沙火車站，難民都是搭乘火車抵達首都，但西車站的則是搭乘客運，有些就是從馬里烏波爾出發的，上前採訪，她們拿出手機，秀出自己的廚房如何被炸出一個大洞，有些人直接說自己患上了 PTSD（編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就算是公車發動的聲音，都能讓她們瑟瑟發抖。

直擊難民收容所，場景也是令人鼻酸。一場戰爭讓他們必須在沒有什麼隱私權的環境下與其他人席地而睡，母親們只能一邊盡全力減少小孩的心理陰影，一邊必須堅強的面對與丈夫分

離。這些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女人，因為最莫名、最殘酷的戰爭，一個個被迫做到「為母則強」。

再前往邊境，衝擊更是巨大。

抵達波蘭東南部城市梅迪卡，要開上 5 到 6 個小時的車程，途徑一個加油站，發現波蘭人覺得油價很貴、加上很多烏克蘭車輛加油，也找到了可以採訪的新聞點。但這裡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對開車逃難的烏克蘭父子。好奇問問這位 30 歲的男子開了多久的車，他說「七個小時」，自然也好奇他怎麼沒去從軍？他指了指父親，這時才發現，原來他的父親雙眼失明，母親早就離世，他就是父親的雙眼。

這次目標是希望直擊不同的邊境，觀察不同之處，因此走訪的有徒步進入波蘭的、搭火車進入的、乘坐客運或轎車的；也發現到了夜間，還是有大批的難民湧入波蘭。

抵達可以徒步走進波蘭的梅迪卡邊境時，天氣

陰沈，非常的冷，氣溫介於  $-2^{\circ}\text{C}$  到  $5^{\circ}\text{C}$  之間，日夜溫差極大，當地人告訴我們入夜後  $-12^{\circ}\text{C}$  都是常態。那裡的志工團體很有愛心，設置快一公里的救濟帳篷，基本上要什麼有什麼：熱食、糖果餅乾、尿布、奶粉、電話卡、玩具、急救站等等。

不過剛踏上安全之地的難民們，各個表情疲憊，接受著各界的溫暖，但他們的徬徨正要開始。以後的生活怎麼辦？他們真的不知道，他們只知道希望這兩三天，可以先好好睡一覺。

在邊境採訪時，聯合國也公布一項最新數字，每一分鐘就有 55 位烏克蘭孩童被迫成為難民，等於平均每一秒鐘就有一位，但這部分要如何呈現在新聞採訪中？當時心生一計，用 Google 翻譯現學了一句烏克蘭文「你叫什麼名字？」，一個個去問了排隊等著上難民公車的小孩。

沒想到小朋友還聽得懂我的烏克蘭語，一個個回答了自己的名字。問了七個小孩，一個名字就是一秒鐘，電視新聞的「黃金七秒」剛過去，烏克蘭又有七個小孩因為戰事被迫成為難民。

在邊境還有個特別的觀察：逃出來的烏克蘭女人都穿著厚厚的羽絨大外套，但有部分人則穿金戴銀——超美的紅寶石的耳環、超浮誇的珠寶項鍊，不過還是跟其他人一樣都是拖著行李、拉著小孩，只是這些珠寶跟他們的穿搭完全格格不入。稍微思考一下，原來逃難的他們是把最貴重的財物都帶在身上，也許直接戴上也是覺得才不會弄丟。

前往普熱梅希爾，當地的火車站也被擠得水泄不通，我卻碰上了火車因為疑似駭客攻擊，6

成全面停駛的狀況。有些難民很焦急，因為帶著小朋友怕他們疲憊得受不了，有些人卻很淡定，悠悠的說「都逃離家鄉的戰火，這裡多等一下，無妨」。在這裡，也碰上第一位在鏡頭前落淚的難民，她說著說著就掉眼淚了，訴說著離家的無奈與委屈，她也不知道未來要怎麼辦。

到了東部城市多羅胡斯克，跟其他邊境一樣，都有難民出沒、也有愛心帳篷，但發現這竟然有長長車龍準備回去烏克蘭。好奇敲車窗詢問，有男人面無表情的回答自己要回去打仗、但眼神藏不住苦楚；有女人說要陪著丈夫回去：「丈夫打仗，我們當後盾」；也有人說自己跟朋友相約逃到波蘭，等了好多天都碰不到對方，只好決定回去找找。

戰爭真的太殘酷。

**採訪完烏克蘭難民，下一個重點就是要探討，波蘭如何因應這超過 220 萬的人潮。**

波蘭本來就有 150 萬名烏克蘭人在當地工作，大部分從事藍領行業，波蘭人對於烏克蘭人是不陌生的。不過每個城市都做好準備了嗎？當然不是，但這不一定是哪座城市的錯，是因為人數真的太多了。

以華沙為例，不到三週，華沙的人口就增長兩成，市政府把國家足球場變成了登記所，但人數實在太多，難民要登記身分證字號，等上三天是最基本的。

前往的東部海烏姆和多羅胡斯克，因為難民都是選擇過境，市政上沒有太大的衝擊，剛開始有點手忙腳亂，但也逐漸上手，更在當地觀察



劉亭廷採訪海烏姆的戶政事務所，了解他們是如何快速協助難民取得波蘭身分證字號。（圖：劉亭廷提供）

到用智慧城市的方式管理。例如擔心來帶難民離開的司機意圖不軌，軍隊和警察合作，會先進行身分調查，而且司機和難民都會戴上手環，方便確認和追蹤。

我們也特別到了波蘭西部城市弗羅茨瓦夫採訪，作為波蘭第二大金融中心，那裡常年都有烏克蘭人在當地工作，也好奇市府怎麼協助烏克蘭人融入當地社會。他們也制訂配套措施，例如開課程先讓孩童學習波蘭語和文化、之後才到校上課；以及有安排市府人員一對一協助等。

前往弗次瓦夫，多年前曾採訪了「金正恩」分身的演員 Howard X，他突然發 email 問我有沒有興趣報導從烏克蘭逃離波蘭的「澤倫斯基」分身演員。他說對方在波蘭籍「普欽」分身的協助下逃離到弗次瓦夫。我急忙回覆，對了一下行程，發現竟然跟自己的行程沒有衝突，趕緊約訪。

不過過程一波三折，這考驗如何獲取受訪者的信任。因為「澤倫斯基」曾被莫斯科盯上，出重金要他到俄羅斯拍攝心戰喊話片，他卻拒絕。因此他一度對我們很不信任，所幸後來碰

上面，與假「普欽」一起受訪，也明確表示，他們想用詼諧和反諷，力挺烏克蘭的決心。

雖然這是一個比較輕鬆的新聞，但也看得出戰爭，各行各業的無奈。

戰爭中也有種種暖心的舉動。

我們在弗次瓦夫碰到了在波蘭工作的烏克蘭人接收 21 位烏克蘭難民，兩層樓的房子全部擠滿了人，連樓梯口都放了床。但因為其中一個逃難的女性帶上兩隻大型犬，實在會影響他人，因此安排她睡車庫。她沒有絲毫怨言，覺得能跟愛犬共眠，是戰爭中唯一能讓她舒心的事情。採訪時問她有無打算找工作，她卻面有難色，指出除了要照顧狗狗，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在烏克蘭本來就有白領階層工作，就算在波蘭找到了工作、但她覺得也是短暫的，到時候得回家時，要怎麼不給新雇主添找代替新人的麻煩。

另外，我們也採訪了收留烏克蘭母女的波蘭家庭。談及原因，她簡單說一句「如果是我兒子遭遇同樣情況，我也希望有人會這樣對待我們，想到這裡，我能不伸出援手嗎？」。

當然也有台灣人的故事，我們在盧布林採訪二月底至三月初，為旅烏台人提供短暫休息、住宿的旅波台人。他們緊急配合駐處的需求和調度，提供宿舍和熱食，讓三班次的台灣人撤離烏克蘭後，有個溫暖地方可以休憩。

這些故事讓戰火無情的背景下，增添了一絲溫暖。

**出門前給自己訂的一大功課和目標，就是希望**

**能約訪到高階官員的專訪，從決策者那邊第一手掌握他們對於戰事的觀點。**

最感謝各界協助牽線在波蘭順利約訪了波蘭總統府國際政策司司長 Piotr Gillert，他主要負責協助制訂總統的國際政策，當然我們也談及了波蘭在戰爭中的角色、俄國的侵略、以及各大國的態度；另外約訪的波蘭外交部發言人 Łukasz Jasina，談及譴責俄羅斯行徑、以及台灣的援助等議題。

感謝他們願意直接接受台灣媒體的採訪，讓我們可以直接提問，再把他們的看法傳遞給我們的觀眾。

Piotr Gillert 的背景很有意思，他曾經是波蘭駐中國使館代辦，等於是該使館的二把手。他在北京前後生活了 15 年，說了一口超流利的中文。有趣的是他曾當過記者，見面時，他分享了自己 1999 年到 2004 年曾是波蘭媒體駐北京的記者，2000 年時，他跟隨外媒記者團到過台灣見證、採訪第一次政黨輪替。他於 2010 年進入波蘭外交部，而從他的背景和資歷來看，可見他對於亞洲、乃至兩岸事務是相當了解的。

採訪他的那一天是 3 月 21 日，白宮才剛公布拜登即將訪問歐洲，最後一站即是波蘭。因此當天的採訪主題，自然從這最新的新聞點開始問起，之後轉向俄烏戰爭、中國政府的角色等問題。

波蘭在這次戰爭的角色是頗被外界關注的。從地理和地緣政治開始說，波蘭緊鄰烏克蘭，除了有邊境的相連，主要是波蘭的北約和歐盟成員國的身分，也讓波蘭成為西方盟友的最前線



獨家專訪波蘭總統府國際政策司司長 Piotr Gillert。（圖：劉亭廷提供）

防線：例如戰爭還沒開始，美方已經加派駐紮美軍軍力、之後也增加部署愛國者飛彈防空系統；戰爭爆發後，盟軍也以波蘭為補給轉運陣地，向烏克蘭輸送武器。

波蘭曾歷經被納粹德國和蘇聯分割的歷史，最近也常被拿出來討論。比起很多其他歐洲國家，波蘭對於國家被侵略、被分裂，他們更明白這切身之痛；再加上擔心俄羅斯持續擴張，因此波蘭在人道和軍事上聲援烏克蘭的聲音從未減少。

但波蘭與中國的關係近年來更是頗微妙。

波蘭總統杜達曾在 2 月 7 日與習近平會晤，討論促進雙邊貿易，更是北京冬奧開幕時，唯一前往出席的歐洲領導人（當時其他歐洲領導人因為中國人權問題而抵制出席）。戰爭爆發後，中國態度相當不明確，因此也自然好奇波蘭總統府如何看待中國應該扮演的角色。

Piotr Gillert 聽到我的題目，第一反應是說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問題，他回答認為中國自然能扮演重要角色，更指出「中國能作為調解員、和事佬出面」，同時指出「現況依賴中國朝這個方向採取行動，當然這是很複雜的任務，我們能理解，但帶來和平也符合中國的利益」。我個人覺得這個答案的特別之處在於，對比很多歐洲國家呼籲或譴責中共應該在這場戰事如何明確表態，波蘭的態度是委婉、卻很堅定。波方沒有明確說中國應該如何，但用了「符合利益」這說法，指出北京政府有責任、有義務更積極讓這場戰爭儘早結束。

首次到波蘭，便進入總統府採訪，老實說踏入該棟建築的當下，心情難掩激動，因為之前做功課發現，歐洲第一部憲法《五三憲法》就是在那裡起草的。我們從側門進入、做完安檢，一位英文說得極好的總統府人員出面接待，簡單寒暄跟我們說實在抱歉，因為總統府正在裝修，要繞遠路，才能抵達受訪者的辦公室，我們便開啟了另類的「總統府觀光」。

我們穿越了超大的長廊、路過總統府內的教堂、經過大大小小的會議室，但每一處的建築風格明顯不同，因此好奇向總統府人員請教波蘭總統府的建造年份，他跟我們說建築建於 17 世紀（1643 年），原本是巴洛克式風格，但歷經大火後毀損，之後以新古典主義風格重建，於 1818 年完工，更是華沙少數未在二戰中被炸毀的建築。

而我們與波蘭外交部發言人 Łukasz Jasina 的採訪過程也很有趣。

我在轉機赴波蘭的途中一直與他聯繫，也敲定

抵達華沙的第二天採訪他。他與我們約住家樓下採訪，原因是他剛被解除自主健康管理——他原訂要隨外交部長去紐約開會，但因為快篩採陽性、最後無法前往，後來 PCR 確定陰性，便被解除隔離。

他於 2021 年 9 月上任，過去曾擔任評論員和主持人，同樣是記者出身，很熟悉新聞的作業流程，採訪過程很順利，對於各項問題自然信手拈來。

波蘭與中華民國台灣沒有正式的外交關係，但近年來互動交流持續增加，波蘭去年曾送台灣 40 萬劑 AZ 疫苗，是繼美國、日本後，第三大援贈國家。不過波蘭對於「一中政策」的態度很明確，因此無論是談到台波關係或是談到台灣捐贈物資等問題，這條紅線波方在採訪中說得很清楚，但也同時強調很感謝台灣社會的幫助。Łukasz Jasina 就提到「我們送你們一點點疫苗，現在卻收到這麼棒的回應（指物資捐贈）」，我想這就是所謂「善的循環」吧。

另外，我們在波蘭期間特別走訪了熱舒夫機場。外媒和美軍軍媒從 2 月份便開始報導和拍攝揭露，北約各國也把波蘭這座機場改為對烏克蘭的後勤運補基地，大家常聽到的刺針、標槍飛彈都是經由這裡轉運至烏克蘭境內。盟軍選擇這裡不外乎就是戰略地理位置，因為很接近 E40 高速公路，這些軍武則會利用陸路交通的方式，直送至基輔等地。

到了這座原本是民用機場，後來改成了軍民兩用機場，除了看到大批的美軍駐紮，機場周邊也部署滿滿的愛國者飛彈系統。作為在國內跑軍事的記者，這畫面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認得出飛彈系統也感謝國內的軍事專家們幫我

再三確認），但不習慣的是他們升起就防空戰術位置。在國內的演練，雖然也曾目擊國軍操演，可是在當地能感受的就是戰爭，毫無虛假的成分。

歐洲採訪行程原訂 3 月 25 日便要畫下句點，但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美國白宮突然宣布拜登總統將出訪歐洲，更預計在 25、26 日訪問波蘭。面對國際情勢的詭變，西方強國即將出招，公司和我都明白機不可失，決定延長採訪行程。



拜登來訪，劉亭廷卡位波蘭總統府門口連線。（圖：劉亭廷提供）

然而，拜登總統即將到來，有隨行的白宮記者團；我們作為在波蘭的外媒，一來難以就近取得行程資訊，二來也不知道是否能獲得允許到場連線訪問，採訪規劃滿是變數，立即考驗當下的應變、適應能力，甚至要有一點，運氣。

幸好，在各方集氣、幫忙之下，凝聚了足夠的運氣，為我們的採訪開道。

拜登還沒抵達之前，華沙已經進入高度警戒。

地陪幾天前告訴我們非常確信拜登將下榻市中心萬豪酒店，原因是賀錦麗和布林肯月初到訪時也都是如此，更特別指出「上次賀錦麗來，市中心交通都被封鎖」。這也讓我們還沒有離開華沙、前往弗次瓦夫之前，趕緊處理住宿安排、預訂距離萬豪最近、徒步距離的其他飯店。

從弗次瓦夫回首都後，在 check-in 時，觀察到了飯店住滿了各國的外媒同業，大廳間看著同業們拿著腳架、連線設備等，有種莫名的親切感。警察則已經開始在外頭的道路，架設圍欄、做最後的維安整備。

3 月 25 日一大早，配合台北連線需求，我們到了萬豪酒店附近，這時候距離拜登抵達華沙還有 9 個小時，他此前會先去一趟熱舒夫機場慰問駐紮美軍。雖然大馬路還未實施交管，但萬豪周邊的道路早就已經淨空，警察、波蘭軍隊、美國特勤人員早就層層在外警戒。我們選擇在距離飯店 50 公尺外的空地連線，他們有上前例行性盤查，當然我們也配合驗證身分，採訪工作未受阻攔。

當天我約訪一些波蘭媒體人談及俄烏戰爭爆發後一個月的分析，其中一位電台主持人的辦公室便在華沙城堡廣場的斜對面。印象很深刻是，早上 11 點多我們進入辦公室前，外頭一切看似正常，採訪完畢、時間剛過中午 12 點，踏出大樓，外面已經開始架起層層圍欄，警車進駐警戒、電台門口則有 NBC 主播在連線。

我們隨即調整行程，馬上先就附近氣氛與台北即時連線，之後為配合其他時段，徒步走向 500 公尺外的波蘭總統府，繼續介紹拜登抵達前的情況和氣氛。

拜登下午兩點多抵達熱舒夫機場，按原訂行程，波蘭總統杜達應該已經當地迎接。不過看著外電畫面，怎麼看都沒看到杜達，原來他的專機，因為機械故障、折返華沙、緊急降落，與拜登會晤大遲到；但我們既然人在華沙、如何掌握？所幸這些訊息波蘭媒體以及推特都即時推播、波蘭總統府也很快做出回應。

拜登傍晚抵達華沙，首都的警戒也進入最高層級，市中心的交通——轎車、公車、電車、捷運一律停駛，萬豪酒店附近看熱鬧的民眾人數也越來越多，我們也在其中。不過拜登抵達飯店已經是台北時間的凌晨兩點，我們因此選擇在車隊抵達的同時做「準連」（就是 delay 版本連線），以便台北開棚時播出（如果你看電視，有時候會看到「稍早畫面」、而非「LIVE」，就是這種連線類型）。

剛剛提到的運氣，3月26日這一天，相當適用。

我們起了一個大早，提前六個小時到波蘭總統府前卡位，順利卡到一個可以連線的檯子，再碰上了總統府的人員查驗身分，最後順利進入管制區，以外媒身分在波蘭總統府的門口連線。

拜登原訂中午拜會波蘭總統府，卻大遲到，令人焦急萬分。不過，同樣翻了翻推特，發現白宮證實，拜登原來是先會晤了來訪的烏克蘭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這在戰略意義上是很大

的，拜登不前往烏克蘭、烏克蘭的國安高層反而保密低調前往波蘭與美方直接會晤。新聞工作講求速度，我趕緊把所知的資訊，於台北晚間新聞時段，一五一十向觀眾說明，讓國內觀眾能即時掌握會晤進度。

等待拜登抵總統府的這段時間，與現場外媒互動交流，站我隔壁的是波蘭最大商業電視台的記者、她介紹自己從業 20 多年，從小布希、歐巴馬、川普到現在的拜登訪問波蘭，她都負責報導；另外還有日本 TV Asahi 倫敦駐點的記者飛抵採訪，為日本觀眾即時報導，更有遠自智利的電視台記者，搭了 30 小時的飛機，同樣抵達波蘭關注難民潮議題。

能與這麼多厲害的先進一同連線報導，激動心情是難掩的，這時候如何做到平常心是一大考驗，只能在連線前不斷告訴自己千萬不能搞砸，要盡力維持「平常心」。

隨著拜登離開波蘭，我們的採訪也進入「延長賽」階段——公司決定讓我們 4 月 1 日回國。

**前段提到，歐洲的採訪行程延長至 4 月 1 日。**

思考多時，畢竟在波蘭採訪了 14 天，與長官討論如何進一步觀察、掌握俄烏戰爭對歐洲的影響，話題也自然衍生至前往到其他國家，但到底要去哪裡也是一個難題。

而在此行出發前，德國台商獲悉我們將前往波蘭採訪，就曾透過委員辦公室轉達訊息說，「如果有機會去德國採訪，可以與他們聯絡。」

我在波蘭就近觀察兩週，碰上不少難民說他們下一站會前往德國，因此也不禁勾勒我的好奇

心：「去了德國，就算語言有障礙，生活真的會更好嗎、到底在德國要如何生活？」

因此我們很快就拍板決定：去德國！不過這多出來的六天僅去德國、又擔心是否過於單調？思量多時，與前輩討論，另一個國家浮出腦海：立陶宛。

能與立陶宛政界結緣，起因是去年國會友台小組訪台，友台小組主席 Matas Maldeikis 來台前有機會專訪對方、他抵台後也有機會進一步交流。於是打了一通電話希望能尋求協助，對方也很阿莎力的答應。

因此就這麼決定了，五天去兩個歐洲國家！

第一大問題是時間分配。我們決定在拜登離開波蘭時，搭乘火車從華沙出發，幾乎與周日凌晨抵達柏林，白天馬上進行採訪，卻碰上德國因為星期日是休息日，fixer 協助安排的約訪



劉亭廷（左）與柏林的 fixer Felix Lee。Felix 是當地平面雜誌的記者，精通德文、英文和中文，協助約訪各官員。（圖：劉亭廷提供）

全部都得安排到周一才能進行。

如此一來只能調整稿子方向，把烏克蘭難民潮以及德國民眾怎麼看待戰爭等直擊報導，全部排在周日進行。

我們一早在布蘭登堡門前連線完畢後，決定沿著菩提樹下大街走，看一看俄羅斯駐德國使館的情況。不出所料，俄羅斯大使館門口進行管制，民眾不得直接走過館外人行道，而是要過馬路經過對面的空地公園，那裡則有德國民眾設置的反戰場地，更設置一個牌子命名為「自由廣場」——取自於烏克蘭哈爾科夫的「自由廣場」，藉此抗議俄軍無情轟炸。民眾在地上擺滿一堆玩具，紀念戰爭中無辜罹難的小孩。歐洲國家的民眾通過這種方式表達他們對於俄軍入侵烏克蘭的不認同。

我們也直擊柏林火車站、拍攝搭乘火車從波蘭抵達德國的烏克蘭難民，由於免付車票，無論是頭等或二等艙，都是滿滿的烏克蘭人。前面提到我很好奇，烏克蘭語與波蘭語相近，預計六個月內學成後者不是問題，但來到德國，不懂德語，如何生存？抱著這題目，採訪了火車站的難民，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兩位。

一位是 22 歲的基輔大學財經系學生，會來到德國是想要到鄉下投靠親人，暫時躲避戰亂。說著這一口流利英文，她表示戰爭結束後，她一定會回國，但如果真的無法回家，她想想學習德語應該不會太難。

另一位是有這三個小孩、年紀不到 30 歲的婦女，她用烏克蘭語跟我說知道波蘭文比較好學，但來到德國也是為了尋找更好的工作機會、不排除落地生根；如果真的溝通不良，她

決定暫時依賴手機的 Google 翻譯軟體。

德國在接收難民上有多次經驗，因此也採訪旅居德國多年的台籍學者，談及對比之前收容敘利亞難民與這次烏克蘭難民的差異性。傍晚時分剛好碰上德國民眾聚集在布蘭登堡門前，與美歐國家串連聲援烏克蘭慈善籌款晚會的活動。歐洲各國民間聲援烏克蘭的聲音持續增加，在俄烏衝突中，德國的角色是很有意思的。

從一開始的不願介入，到後來政策轉向，但受限於現實壓力，德國作為歐盟與北約的領導角色中，總會出現卡關的情況。不過，蘇聯勢力擴張、冷戰帶來的歷史傷痕，對於德國又是如此的切身之痛。

隨機街訪，民眾呼籲政府應該加緊制裁俄羅斯能源，更有人直接喊出不相信德國無法找出其他的替代方案。這個聲音不只在民間，部分政界也有類似喊話，而這時也要感謝 fixer 協助約訪德媒 China.Table 創辦人 Sebastian Turner，他是當地很有影響力的媒體人，曾任德國全國性日報《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 的發行人，他也加入聲援支持德國應該制裁俄羅斯能源。

周一，我們啟動忙碌的採訪行程，重頭戲是採訪現在為德國聯邦（外交事務）議員、前柏林市長 Michael Müller。作為執政黨一員，他的執政經歷讓他透析兩岸關係，自然也針對當前的俄烏情勢，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和看法，更提到了德國對於支持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明確立場，同時談及了德國目前努力改變對於俄羅斯能源的依賴性，但最大問題是仍需要一些時間。

另外我們也走訪了區政府首長、再到地方的民眾，盡力從各層面看解析他們如何看待這場戰爭。與德國人交談，能感受他們非常關心戰事，也期待政府能更積極處理，不過也很謹慎的了解德國目前手上籌碼真的不多的無奈。

我們下午則特別到了柏林圍牆做 STAND 和連線。柏林是一個被二戰幾乎轟平的城市，之後的冷戰更被主義思想硬生生分裂，還有一座樹立 28 年的實體圍牆。隨著 1989 年冷戰鐵幕落下，33 年後的今天，烏克蘭是否也會成為下一座鐵幕？或者根本不需要實體的建設、這座無形的「牆」似乎開始在東歐出現……。

在柏林待兩天時間後，周二一早六點，我們搭乘最早的班機飛抵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為何要去立陶宛採訪？除了關心她與白俄邊境的危機，更是因為立陶宛這幾年在歐洲都以「很反俄的形象」存在著、以及她為北約成員國的角色。**

這麼剛好，抵達的 3 月 29 日，正是立陶宛加入北約 18 週年慶祝活動。除了各國盟軍代表出席，美軍也搬來 120 公釐迫擊砲以及軍車，現場孩童直接爬上軍車車頂，現場直接上演「全民國防」教育。

歐洲國家普遍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其中立陶宛民眾更是以最諷刺、最幽默、最打臉的方式，想盡各種方法抗議俄軍行徑，為此我們特別走訪了俄羅斯駐立陶宛的大使館。

我們在維爾紐斯通勤，都是利用 BOLT（類似 Uber）的手機 App 叫車，俄羅斯大使館的地



劉亭廷（左）與攝影記者洪復華在波蘭總統府前合影。（圖：劉亭廷提供）

址則是座落在「烏克蘭英雄街」上（如果你用 Google Maps 搜尋也是如此）。維爾紐斯市政府為了抗議俄羅斯，三月上旬索性把俄羅斯使館門口未命名的馬路取了這個新名字。在此之前，俄羅斯使館地址使用的是前面另一條「拉脫維亞街」，如今這「烏克蘭英雄街」的路牌更是直接座落在使館的大門口前。當時的媒體報導還指出，如此一來，俄羅斯使館人員，就必須更換名片，新名片上就會被迫印製「烏克蘭英雄街」的新地址。

抵達使館，外頭有一座小橋墩，欄杆上全部繫滿了藍黃色的緞帶，附近的樹上還有抨擊普欽的海報，雖然普欽的肖像早就被撕去。被誰撕的？不清楚。民眾也在使館門口地上用噴漆漆上「普欽，海牙國際仲裁庭正等著

你」這句話。不得不說，諷刺、抨擊俄羅斯，立陶宛人可是相當有創意。使館門口有一輛警車戒備，但看到媒體，警察完全沒有下車詢問或盤查身分，幾乎都躲在警車裡，或許也是習慣這幾天很多媒體爭相到現場拍攝吧。

臨時拍板去某個國家，採訪行程都必須滾動式調整，也特別感謝中華民國外交部同仁協助我們與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聯繫，黃鈞耀大使更是全力支援採訪，讓我們可以走訪開箱辦公室。當初他們挑選了辦公室，看了將近 20 間，最後選定這棟接近國會的大樓。不過同業既然曾到訪過，如何做出不一樣的角度也考驗著我們。

另外，最感謝的是立陶宛國會議員們。

除了關心立陶宛——台灣關係，立國跟中國關係也是我們關心的重點之一。立陶宛國會友台小組主席 **Matas Maldeikis** 更配合與我們在「中國駐立陶宛代辦處」前訪問，指出立國因為制裁而受到的壓力，更談及俄烏戰爭後改變了國內的輿論。他透露去年訪台回國後，因為國家受到北京政府的各種壓力，例如阻止德商投資立陶宛，因此一度受到反對黨的抨擊，但看著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國內的風向瞬間改變，反共成了不分黨派的集體共識。

此外，我們有機會走訪立陶宛的國會，與外交以及國安國防委員會主席分別進行訪問，討論了立陶宛對於北約長期駐紮軍隊的期盼。但立陶宛國會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大會議室內的一幅大照片，場景正是立陶宛國會門口。國會助理跟我們說那是著名的 1991 年「一月事件」。立陶宛最高議會通過立陶宛通過了《立陶宛復國法案》，決定脫離蘇聯獨立，被戈巴契夫否決，但當時的最高議會發言人維陶塔斯·藍茨伯基斯（也就是現任立陶宛外交部長的爺爺）等人拒絕。蘇聯因此派出軍隊鎮壓，拿下了國防部等重要設施，民眾則自發性聚集，守衛最高會議大樓（現在的國會）、廣播電台、電視塔、主要電話局等重要據點，圍成人盾，每個人都自願當「坦克人」，其中就包括這位助理的爺爺。

立陶宛民眾嚮往自由、民主的心隨處可見，包括路上碰到民眾知道我們來自台灣，他們就會熱情的跟我們說「一定要加油」。碰到年邁的退役校級軍官，他在北約慶祝大會上揮舞自製的巨幅北約旗，詢問、知道我們來自台灣後，他豎起大拇指說「我的心與台灣同在」。

我們此行也前往了立陶宛的外交部，專訪立陶宛駐中國大陸大使米凱維切涅 (**Diana Mickevičienė**)。北京政府因為不滿立陶宛允許台灣設代表處，因此要求立國召回大使，之後也發生了立陶宛駐大陸的外交官們及家眷連夜撤離北京的事件。米凱維切涅受訪時也以自己國家的立場質疑北京政府「雙標」，認為他國與台灣交流沒問題，自己卻被制裁，也強調他們不認為這違反所謂的「一中政策」。

在德國旋風式採訪 55 小時、在立陶宛待了 69 小時，這五天兩個歐洲國家的行程也告一段落了。

終於，22 天的歐洲採訪行程，從在波蘭的深度採訪，之後轉戰德國，最後在立陶宛畫上句點，衷心期盼此趟有確實給觀眾們不一樣的視角和啟發。



中央社駐土耳其記者鍾佑貞（左）、駐印度記者林行健（右）2022年5月24日在位於波蘭盧布林市的烏克蘭領事館外，秀出取得的烏克蘭簽證。（中央社提供）

## 前進烏克蘭側記： 記者見證民眾戰火下誓不屈服 採訪證一度被標成中國

鍾佑貞 / 《中央社》駐伊斯坦堡記者  
林行健 / 《中央社》駐新德里記者

中央社在 2022 年 5 月指派兩名駐外特派前往烏克蘭，採訪俄烏戰爭爆發約 3 個月之後的情勢與影響。由於戰爭仍在持續，且台烏關係並不密切，能否成行存有變數，但記者做足功課，憑一己之力先後申請到採訪許可與簽證，並完成採訪任務，於 6 月 3 日烏克蘭遭全面入侵 100 天之際推出系列報導。

以下依序是中央社駐伊斯坦堡記者鍾佑貞與駐新德里記者林行健的採訪心得：

鍾佑貞

俄軍在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之後，大批西方媒體每天從烏克蘭發出報導，對於戰事爆發超過 3 個月才實地採訪的我們來說，重點是讓報導的內容與外媒有所區隔，盡可能驗證有些我們已經知道的新聞，同時避免煽情，用台灣讀者的觀點，報導這次衝擊烏克蘭數千萬人口乃至全球各國的重大歷史事件。

台灣與烏克蘭沒有正式關係，甚至民間往來在過去也不頻繁，中央社記者要在戰時前往烏克蘭採訪有許多不確定性，包括可否取得簽證、

簽證到手之後能否順利入境、入境之後採訪是否受限等等。考量層層難關，一開始對這次的任務感到忐忑不安。

出發前夕，聽聞有台灣同業即使取得烏克蘭軍方發給的採訪許可，卻仍無法拿到簽證，焦慮感大增。5月24日上午10時30分，向烏克蘭駐波蘭盧布林領事館遞件後，領務人員檢視護照一會，手指護照上的「台灣」字樣說：「我們不發簽證給這個地方。」

### 烏克蘭領事館申辦簽證 有驚無險的一整天

但烏克蘭駐土耳其大使館對我申請前往採訪非但沒有異議，還同意代為聯繫駐盧布林的總領事館，只是大使館依烏克蘭政府規定，不能核發簽證給記者。我向領務人員出示前幾天與總領事詢問簽證所需文件的往來訊息，他端詳內容後離開座位，接著就是等待。我心想要嘛可以進到烏克蘭採訪，要嘛就只能寫一篇「盧布林一日見聞」交稿。

到了下午4時，領事人員還在一一檢查我護照上的出入境紀錄，然後問我：「你去過俄羅斯及亞美尼亞，目的是？」事前已聽說有人因進出俄羅斯的紀錄被發現而遭到烏克蘭當局質問，因此被問到這個問題時並不驚訝，但還是不免緊張。我是在2018年到俄國，在那之前3年去過亞美尼亞，都是自助旅行。

經過一番折騰，護照上最終蓋上可在60天內多次入境烏克蘭的簽證。我們兩人在黃昏時分，興奮地拿著簽證頁在領事館門口拍照。我到波蘭才一天多，行健是今天才到盧布林，雖然有些細節不足為外人道，但事情進展超乎我們想像的快速。

我們隔天就從盧布林搭巴士前往基輔，車程要11個多小時，我們兩個是車上唯一的亞洲面孔，一路上只聽到偶爾有人低聲交談。我們要去採訪時，每天回國的烏克蘭人超過離境避難的人數，也許因為這樣，當巴士通過邊界進入烏克蘭，邊境警察現身，車上響起一片歡呼，氣氛頓時輕鬆不少。巴士離基輔越近，乘客臉上越多顯現笑容。

若非道路上有水泥掩體、路障，首都近郊有焦黑被毀的商場，基輔人的生活表面看來已經恢復正常。外人很難想像才幾個星期以前，俄軍坦克和部隊就在首都的外圍肆虐，基輔本身也岌岌可危。記者詢問一名少女市區搭車地點，少女馬上拿起手機幫忙叫車，一邊揚起下巴指指記者身上配掛的採訪證，「車3分鐘後到，烏克蘭需要你們」。

面對戰爭衝擊，似乎每個力求過正常生活的烏克蘭人都有難掩、外人無法想像的痛楚。協助叫車的少女名叫莉薩（Liza），是21歲的大學生，基輔首度響起空襲警報的當天，她急忙躲進地鐵站。她說，如今她再次搭乘地鐵時，才發現恐懼襲來，好像要跨出腳步上車都感覺困難。

另一位基輔市民歐莎娜（Oksana）頭戴棒球帽，起初在接受採訪時神情漠然，但講到親友仍在俄軍占領及破壞地區時，突然情緒潰堤，在街上頻頻拭淚，好像好久找不到人可以傾訴一樣。

在記者到訪的前幾天，東部第一大城哈爾科夫（Kharkiv）剛遭到俄軍轟炸，城內不時響起空襲警報，街道冷清，除了軍人、記者及陪同

### 林行健

「什麼？你要去烏克蘭？不會吧！」這是朋友聽到消息後的第一個反應。但身為記者，不是哪裡有危險就往哪裡去嗎？因此接到主任電話詢問出差意願，我只猶豫了一秒就答應了。與其說是「猶豫」，不如說是「愣」了一秒：「烏克蘭？有沒有聽錯？」

由於台灣似乎未有同業在戰事爆發後取得簽證進入烏克蘭採訪，因此我們必須自己摸索出道路。所幸，駐地曾赴烏克蘭的印度同業告知申請烏克蘭簽證的大概程序，我們也順利在駐地購得烏克蘭軍方規定必須準備的防彈背心和頭盔。

有關俄烏戰事，西方媒體的報導篇幅既多且廣，我們此行希望為讀者帶來具台灣觀點的第一手報導。畢竟，烏克蘭與台灣在某種程度上有著相似的處境，而這場足以改變台海與整個世界戰略局勢的戰事，也可能影響台灣、烏克蘭與中國的三角關係。

台灣人以募款、停止向俄羅斯輸出品片等方式挺烏，經媒體報導，讓許多烏克蘭人相當感動，雖然烏克蘭官方因忌憚中國在這場戰事上放棄「中立」轉挺俄羅斯，而未在烏台關係上邁進一步，但在民間，友好的種子已經埋下，未來可望發芽茁壯。

### 採訪證原本寫中國 幸好能正名

不能不提的是，烏克蘭軍方發給我們的採訪許可證，值得永久保存，但故事原本不是這樣。起初領到的版本國籍欄寫著「中國」，經記者



中央社駐印度記者林行健在基輔市郊有坦克墳場之稱的地方，拍攝一台3月間試圖進軍基輔但遭守軍摧毀的俄軍坦克。（中央社提供）

反映，對方半小時之內就依我們的護照封面改為「中華民國（台灣）」，對照的烏克蘭文則是只寫著「台灣」。

除了正名的理由，我們心想，2月24日以來中國網路上有很多支持俄國發動戰爭的評論，在烏克蘭引發反彈。我們為了採訪，即使不情願，也不太可能拒收一開始傳來的採訪證，但也不想被烏克蘭民眾誤以為是來自中國，增加採訪的風險。經過說明，顯然獲得烏克蘭軍方發證單位的善意回應。

順利抵達基輔之後，剛好入住在情治機構旁邊的旅館，每次只能從特定路口進出，除了盤查身分，還要旅館派人到路口來接。一名計程車司機得知我們的住所後開玩笑說，烏克蘭嚴防

俄羅斯間諜滲透，說不定連旅館櫃台人員都是情報人員假扮的。

這句玩笑話可一點也不好笑，在戰爭帶來的緊張氣氛下，頓時令人疑神疑鬼起來，不知窗簾外會不會有人用望遠鏡對著我的房間觀察，行李箱好像也被翻過。但事後回想，感覺真是杞人憂天。兩名經常出門連電腦都沒關機的記者，就算身邊都是間諜，他們也早已看出我們的「無害」。

不過，不時聽聞有外國記者因拍攝禁止入鏡的人事物，例如哨站、防禦工事以及軍人的容貌而被帶到警察局盤問，或是影片遭到刪除。因此我們行事非常謹慎，唯恐好不容易入境採訪，卻因一時疏忽而被驅逐。為避免辛苦的成

果泡湯，我們在拍攝後都儘快把畫面傳回公司。

基輔民眾在街頭喝咖啡的景象，令人感覺首都似乎沒有想像中的危險，但政府和民眾都警告說，戰火的威脅仍在，果然基輔在平靜大約一個月之後，於6月5日又遭俄軍飛彈攻擊。

### 戰爭殘酷 烏克蘭人團結堅忍令人印象深刻

扣除停留在波蘭以及在烏克蘭大城之間的交通往返時間，外加公家機關沒辦公的週末，留給我們拍攝、採訪的時間並不很多，時間壓力加上不熟悉的環境，讓這趟任務更形不易。白天拍影音、採訪，晚上回旅館剪輯影片、寫稿，

熬夜是免不了的。像這樣的外地採訪，對體力和記者魂是個考驗，同時也能檢視一個人隨時隨地休息補充體力的能力。

此次到烏克蘭採訪，令人震撼的是戰爭的殘酷，令人印象深刻的則是烏克蘭人的堅韌。想要以武力服人的俄羅斯，正把烏克蘭愈推愈遠，誠如受訪者所說，仇恨將延續到下一個世代。訪談中，每個烏克蘭人都是同仇敵愾，誓不屈服，堅定支持「去俄國化」，也都深信烏克蘭終必勝利。

這一趟行程，有許多想做的事情沒有完成，但終究我們跨出了第一步。

《中央社》授權轉載  
[www.cna.com.tw/news/aopl/202206100026.aspx](http://www.cna.com.tw/news/aopl/202206100026.aspx)

## 隱形的新聞戰士： 與記者和特派員出生入死的 Fixer

### 楊智強 / 《報導者》記者

我曾經有 3 年的時間，以獨立記者的身分在東南亞國家採訪新聞，國際新聞是我主要關注和負責的領域。進入不同國家採訪，要在陌生的環境下把故事一點一滴拼湊起來，不但必須克服語言、文化、議題背景等等障礙，有時因為議題敏感也會面臨危險。

國際採訪除了記者自己要花時間研究和蒐集資料外，到了國外的新聞現場，通常還需要一位熟悉該議題的當地人士協助，才有辦法在短時間內找到關鍵的受訪者，或者進入一些外國媒體沒有辦法單獨前往的地點。

這個角色在國際採訪的領域裡，被稱作為「Fixer」。

### 記者的當地嚮導、助手兼翻譯

Fixer 這個字並沒有正式的中文翻譯，這個角色就是在國際特派員和記者僱用的當地「嚮導」或是「助手」。他們的工作是協助特派員和記者完成新聞採訪，包括尋找受訪者、聯絡地方政府官員、申請採訪許可等等，有時也可以充當翻譯人員。若採訪的地點是危險的戰地或是情勢緊張的地區，他們還可以對記者安全保護上提供協助，所以 Fixer 和記者之間也要有高度的互相信任。

一般來說，記者在出發前往國外採訪之前，就會透過當地友人或是一些新聞機構和組織的協助，找到可靠的 Fixer 人選。最適合的人選通常是當地的新聞從業人員或有新聞採訪經驗的人，因為他們了解記者工作的需求，並且有一定的新聞敏感度和人脈。

例如，台灣如果在舉行總統大選的時刻，沒有專門在台灣派駐記者的國際新聞媒體，會派特派員來台灣採訪，這些來台灣採訪的外國記者也會在台灣找到合適的 Fixer，幫助他們接洽採訪候選人、政治人物、里長等各種受訪者。

除了選舉這種危險性不高的國際採訪外，像戰爭爆發時，各國前往戰爭地區採訪的媒體記者，也常需要 Fixer 的協助。像 2022 年 2 月 24 日爆發的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就是一個例子。

### 烏克蘭戰爭裡的 Fixer

俄國侵略烏克蘭戰爭爆發後，國際各媒體都派出特派員進入戰地採訪。來到烏克蘭的國際記者幾乎都需要烏克蘭的 Fixer 協助，才有辦法完成任務。這些 Fixer 冒著生命危險，協助國際特派員完成新聞報導，將戰爭的殘酷傳給世界。已經有人不幸罹難。

3 月 14 日，在被俄軍攻擊的烏克蘭基輔北方的村落戈連卡（Horenka），兩位美國《福斯

新聞》（Fox News）的記者與烏克蘭的 Fixer 庫夫希諾娃（Oleksandra Kuvshynova）的轎車遭到砲火波及。55 歲的攝影記者札克塞夫斯基（Pierre Zakrzewski）與庫夫希諾娃都死於戰火，另一名《福斯新聞》的記者霍爾（Benjamin Hall）身受重傷。

除了烏克蘭的 Fixer 庫夫希諾娃，被戰火波及而殉職，還有 2 位烏克蘭的 Fixer 也被俄軍綁架、虐待。這些冒著生命危險協助國際特派員和記者在戰地報導的 Fixer，奉獻自己的專業、甚至犧牲生命，但因為並不是記者，在報導中不會掛上他們的名字，他們協助記者完成報導的努力和付出，過去不會被關注，更別說因為報導所得到的名聲與掌聲。

如今，Fixer 逐漸受到重視，部分國際採訪的文章裡，已經開始把 Fixer 的名字掛在文章中。但有的時候，並不是因為媒體不重視 Fixer、才不掛上他們的名字，而是有些敏感的議題，他們的名字或身分曝光，反而更有可能為他們帶來危險。我自己過去採訪的緬甸羅興亞人議題時，就遇過這樣的例子。

### 敏感議題不能曝光身分

2016 年底，我進入緬甸西部的若開邦採訪羅興亞難民營。因為緬甸政府強制將羅興亞人的居住地點跟當地緬甸人、若開人分開，羅興亞人被圈在幾處受管制的難民營中。緬甸政府更禁止外國記者進入。

若開人跟羅興亞人之間的關係相當緊張，雙方相互仇視、水火不容。當時協助我偷渡進入難民營的若開人 Fixer 說，他從小跟羅興亞人比鄰而居，兩個族群的仇恨，很多都是被政府刻意挑起，他不會恨自己的鄰居。

但是他也知道，若是他的族人發現他在幫助外國記者採訪羅興亞人受迫害的狀況，他會被視為是民族的叛徒、可能遭到暴打。

我記得，當時他和我笑著談論這些內容，但等到我回到旅館沉澱下來之後才驚覺，他是冒著怎樣大的生命危險幫助我進行採訪。

國際採訪新聞如果沒有當地的 Fixer 協助，很多重要的議題都無法被呈現在新聞版面上。他們，絕對稱得上是，隱形的新聞戰士。如果，願意擔任 Fixer 的人減少或消失，可能讓很多國際重要的新聞、甚至戰爭實況，無法被報導和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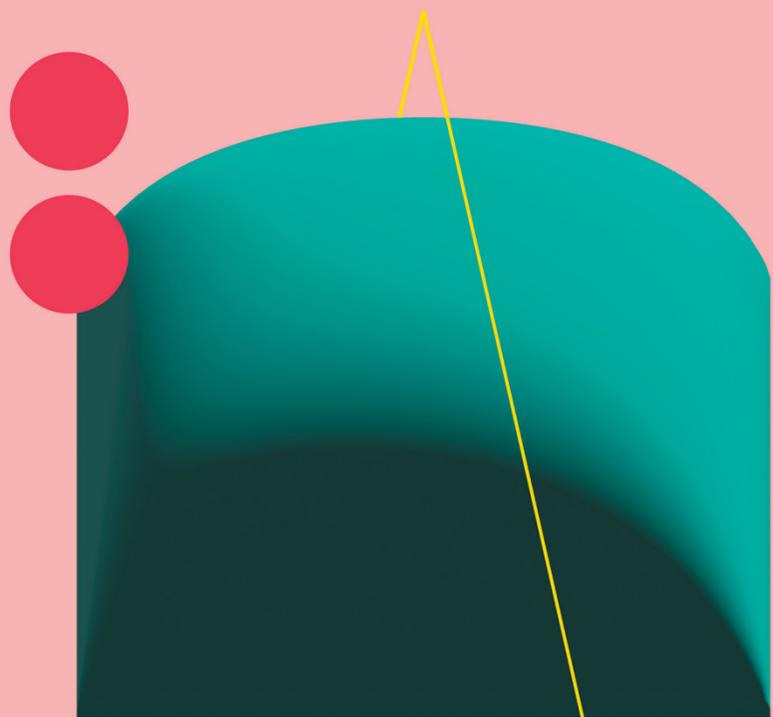
非營利媒體《報導者》授權轉載  
www.twreporter.org/a/russian-invasion-of-ukraine-2022-kid-fixer

20  
22

桃園

鐵玫瑰  
藝術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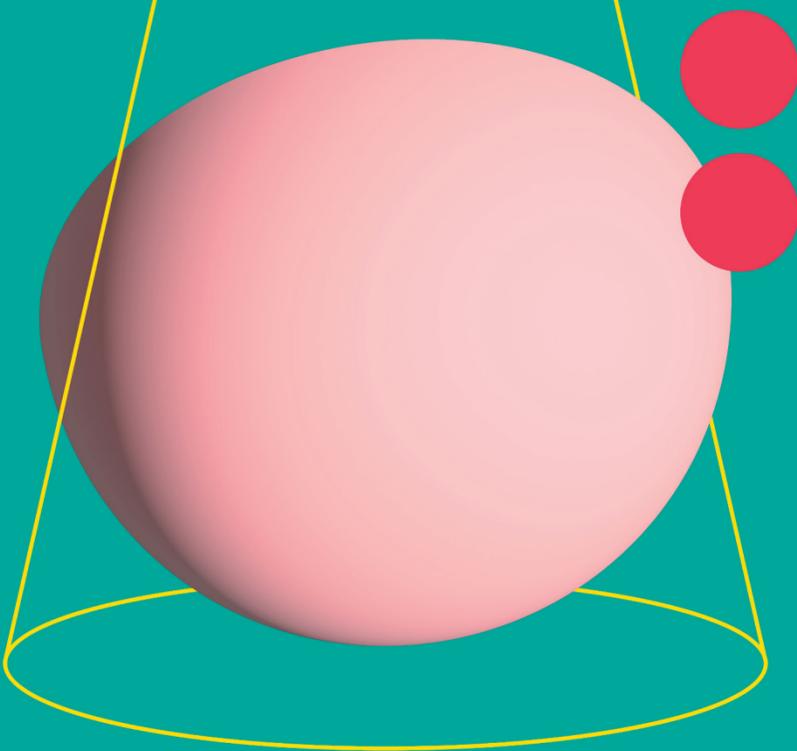
TAOYUAN  
IRON  
ROSE  
FESTIVAL



最初的堅強

STRONG MIND, TENDER LOVE

最後的溫柔



10.22-12.4

桃園展演中心

風雨前行：台灣公廣集團的未來進行式



## 有待來者的長遠革命— 期許台灣公廣集團

邱家宜 /  
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執行長  
曾任公視第六屆董事

經過萬年的文明發展進程，地球人類的命運正處在關鍵轉捩點上。2020年初開始，新冠病毒橫掃全球，不論經濟上的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政治上的民主或極權國家，都受到病毒一視同仁的侵襲，專制與箝制言論自由的國家，相較於民主與尊重言論自由的國家，究竟哪個更經得起一場生物災難的衝擊？除了病毒的考驗，全球民主與極權的對壘在兩年後進入後冷戰時期的高峰。二月間，俄羅斯陳兵一心要加入西方民主陣營的烏克蘭，戰禍至今未熄；八月初，美國眾議院長裴洛西訪台後，中國持續對台灣進行充滿恫嚇的實彈軍演，民主台灣能否為自由世界繼續保留這一席，全球都在關注。

世界紛擾至此，台灣能在全球疫災中、中共軍演下，社會運作如常，其意義不僅是保護兩千四百萬國人身家安全，更昭告世界，只要有足夠的社會互信與精密良善的政治治理，民主體制可以面對病毒侵襲而不亂陣腳，並在強鄰虎視的國際戰略佈局中成功自保。在此關鍵時刻，台灣公廣集團的重要任務，是透過更多、更快、更好的新聞與節目製播，服務關心公共事務、積極行使公民權利的台灣人民；並在國際上爭取過去長期由中國掌控的話語權，不只



面對華文世界，也面對非華文世界。

作為自由民主體制下後進的公共媒體，既未如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或日本放送協會（NHK）趕上廣電媒體發展初期的市場先機，也欠缺如西歐、北歐或南韓由政府直接主導的後續補強，台灣公廣集團從一開始就處在黨國媒體還未完全退場，商業媒體已開始市場火拚的政治與經濟雙重夾縫中，先天不良、後天失調。但即使如此，台灣的公廣還是要奮發圖強，否則無法承擔以下三個任務：

1. 如前面所說，要讓台灣社會的自由民主如何在生物災難中展現韌性，並自保於強鄰的事實昭告世界，透過國際發聲，與中國競逐話語權。
2. 在國內市場太小、資金不足的狀況下，確保本土影視音創作與產業有足夠的資源挹注，不會被對岸或其他影音強勢輸出國淹沒。
3. 在商業媒體無法抗拒低成本內容農場訊息產製趨勢，導致不實、不良訊息橫行，嚴重影響民主社會公民知權與對公共事務的判斷品質，以致危及民主存續的重大危機中，提供正

確、高品質的資訊服務與意見交流平台，營造民主制度運作不可或缺的健全公共領域，保護台灣得來不易的民主成果。

如果認同上述三個任務必須達成，則台灣的公廣不只要存續，還一定非要更健全、更壯大不可。具體作法建議如下，或可供認同前面論述的決策者參考。

1. 將現有公視與華視的資源，透過兩個董事會密切合作，管理階層應放下本位思考，進行資源流通與整合，本諸公廣一體前提，不論新聞資源或節目內容，都以公共服務極大化的前提，做最大幅度的流通。例如，擅長節目製作的公視，完成的節目也給華視去播，華視可以得到廣告收入，公視則可以將華視的收視率也併入計算 KPI。如此花一樣的錢，閱聽人可以得到加倍的服務，是所謂將公共服務極大化。

2. 繼承第一點的思考，全世界的公廣都強調新聞資訊服務，唯有台灣早年受制「小而美」的政治緊箍咒箝制。既然同意公廣早該成立新聞頻道，目前最快到位的方式，是讓華視已具有新聞頻道雛形的「華視新聞資訊台」，進化成真正的公共服務全新聞頻道。將公、華兩台的新聞內容進行統一調度編播，作法與第一點相同，公視的新聞節目也放到華視新聞資訊台（未來可考慮改名為「公廣新聞資訊台」或其他名稱）去播，收視點數也計入公視的 KPI，如此才能在有限的資源下，提供國人更優質的新聞資訊服務。並在現有基礎上，將「公視新聞網」（新聞服務的數位化）進一步擴大為「公廣新聞網」，把華視的即時新聞加上公視的深度報導，進而開發新的數位內容。

3. 為求管理上的一致性，文化部已撥付預算的國際平台，未來不論是以網路播送或申請設立衛星頻道，應比照目前公廣旗下各頻道（如台語台、客家電視台）設立台長綜理台務，對總經理與董事會負責。各台各有任務，各有獨立預算來源，但在公廣一體的設計下，依公視法受相關會計、稽核、財務、人事制度規約。至於公視與華視因體質差異所造成的整合困難，有待日後華視民股買回後再就體制面進一步統整，目前仍須依靠兩個董事會與管理階層密切協調，就實質內容以技術權變方式進行合作，以待日後修法來竟全功。

除了從現況出發所提出的上述具體做法，長期而言，目前的公共電視法架構陳舊，不但無法處理華視、客台、台語台、國際平台的適法性問題（公視法中對這些早已是事實的服務，通通沒有提供法源），需四分之三審議通過的董事會超高門檻，讓公視董事每屆難產，以及法定九億經費遠遠不敷任務所需，也都是必須立刻面對的修法議題。

公廣制度的主要精神在於讓深切體認公廣理念的社會意見領袖、專業媒體工作者與組織經營者，受國民付託，在既有的公廣法規與體制下，依現有資源，提供最大化的新聞資訊及教育娛樂內容，以平衡商業媒體必然受市場驅動或受政治干擾，無法善盡民主社會第四權的弊病。如今公廣旗下各頻道又肩負復興族群文化、突顯國家話語權等責無旁貸的重責大任，公廣之振興與壯大，關乎台灣的未來，路途遙遠、任務艱鉅，但不得不做。

## 公廣的新聞服務何去何從？

李志德 /  
媒體工作者  
曾服務於公視新聞部

片庫誤刪、跑馬錯上、院長成了總統、蔡英文成了蔡 EE……，2022 年公廣集團遭逢水逆，幾天一次，接連出錯。關心台灣公共媒體的同行、專家看在眼裡，只感覺第六屆公視經營團隊藉著戲劇製作打下的口碑，因為新聞服務的失誤，幾近一掃而空。

回顧公視成立以來的歷史——特別是政客惡搞、歹戲拖棚、不堪回首的第四屆。本屆經營團隊主理公視期間，外來的政治挑戰幾乎是零，任期長達六年，手握可能是公視歷史上最豐沛的財務資源；戲劇製播被認為引領起了「新台劇」的風潮。

帶著前人難及的成就，為什麼會在（可能是）任期的最後階段，三天兩頭要到立法院報告、道歉？難堪的場景遍傳全國。為什麼在業界工作條件人人稱羨，以公共良心自許的公廣新聞部門員工，竟然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

先說結論：即使在戲劇製作上創下輝煌成就，但當新聞出錯時，社會的批判仍然毫不留情。這證明新聞服務才是公共媒體的第一職責，也是台灣社會，乃至民主能不能順利運作的根基。廢弛、吝惜投資新聞部的代價，是從哪裡



都補不回來的。

就從這次事故的主角：華視新聞台說起。2021 年 3 月，NCC 同意華視新聞台使用有線電視 52 頻道，這對公廣集團的新聞部門而言，原本是期待已久的一次絕佳機遇：公視從草創之初，因為政治力強力干預，被限制不能製播每日新聞，像一個孩子初生時就被綁了的小腳，也嚴重限制了後來採訪部門的發展。之後幾經掙扎，才有如今的規模。台灣早在 1990 年代，就進入了「全時段新聞台」的時代，觀眾早就習慣在 49 到 55 台之間找新聞看，但公廣集團始終沒有做一次大手筆的投資，成立一個規模和品質足以和商業新聞台競爭的全時段新聞頻道，讓公廣新聞服務至少跟上上世紀 90 年代的腳步。

這時中天被下架，空出了 52 頻道，NCC 政策屬意交給公廣集團，公視和華視高層聯合開了記者會，宣稱共同爭取，但最後證明，從編制、人事派任到節目安排，主導權全在華視，公視做為母公司，在 52 台的規劃上幾乎棄守，這帶來了嚴重的後果：這個公廣新聞工作者期盼多年的全時段新聞台，竟然是依照「華視體制」而非「公視體制」來營運。兩者的分別在

於經費來源：「公視體制」以政府經費為主；「華視體制」名為公廣，但實際上就是一個商業新聞台。

台灣欠缺的，是一個普通的商業新聞台嗎？或是一個高品質、取材均衡、播的是真正重要的新聞，以及（至少暫時）不必太考慮商業利益的新聞台？即使採取「公視體制」都不必然成為後者。但以「華視體制」運作，這個台註定只會掉進「紅海」載浮載沉，不可能開創出「藍海」。

在知道公廣集團極有可能得到 52 頻道時，究竟是誰？經過哪些論證，決定 52 頻道適合以商業體制運營？在承接 52 台，媒體報導華視規劃了 4 億的經費，4 億相信是當時的主事者推估商業損益之後的決定。也就是說，是先用商業收入回推新聞台的規模。但筆者正正要強調，這樣的思路是「讓貧窮限制了想像」。

直白地問：以公廣集團的新聞取材和製作播報要求，有辦法在這麼惡劣的商業電視環境裡取得收視率，從而變現出足以支持一個優質新聞台自負盈虧的商業利益？公視法開宗明義規定，創設公共媒體的目的在於：「建立為公眾服務之大眾傳播制度，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既要彌補商業電視之不足，公廣集團又不願意投資，讓新聞台只能在商業體制裡求活，這思路從頭就是矛盾和錯亂。

批評公廣集團過去疏於投資新聞服務，最好的方式就是從預算來檢視。筆者統計、整理了從 2015 到 2023 年的預算、決算後，一個明確的結論是在第六屆任期中，若以「新聞」、「戲劇」兩大業務相比，資源分配明顯、嚴重地向戲劇傾斜。我們可以從下圖來討論：



公共電視節目、新聞預算配比比較 (圖說)

上頭這張統計圖表比較了公共電視（不含客家和台語台）從 2016 到 2023 年「一般節目製作購買」和「新聞節目製作購買」兩項預算在總預算中的佔比。

2016 年是前前屆（第五屆）任期的最後一年，兩項預算約莫相當，新聞還高一些些。2017 年陳郁秀董事長帶領的第六屆上任後，可以看到從 2017 到 2020 年，戲劇和新聞的預算分配急劇拉大。2021、22 年回到戲劇、新聞約一比一的比例。到 2023 年暫編的預算中，新聞的預算才再度超度戲劇。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少了前瞻計畫的支應，2023 年的預算總數只有 21 億 4 千萬，是八年中最底的。

上圖中的藍色統計——也就是新聞服務預算在總預算中的佔比，約略保持在 12% 上下浮動。如果看數字，大致在 2 億 4 千 400 萬到 2 億 6 千 900 萬之間。這表示，過去七、八年間，公廣集團對公視的新聞服務並沒有重大投資。而公視主要資金來自政府，因此，這樣的預算圖像，也意味著政府對公廣集團的新聞服務，並沒有顯著投資。不僅沒有投資，而且在 52 台的案例裡，甚而在沒有經過太多論證下，轉而走向商業體制。

按最初公視（公廣集團）設計的經費來源，政府捐贈出資是常態，全商業體制反而是華視一

時收不回民股的權宜之計。但 52 台的安排，讓權宜成了常態，反客為主的代價，就是一旦出事，賠上的是公廣集團新聞服務 20 年累積的聲譽。

接下來要回答兩個問題：

- 一、52 台走「公視體制」，運作經費（大部分）以公費支應，但錢從哪裡來？
- 二、用公費養一個新聞台，究竟值不值得？

這兩個問題可以合起來回答。公廣新聞台值不值得？筆者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台灣新聞台的問題，既是太多，又是太少。太多是指頻道太多，太少指的是多元性不足，從（亂到不行）的鏡面設計到取材相似的題材，一節新聞看完，真正有意義的內容沒有幾條，這一台和那一台又往往相互「參考」，原因很簡單：大家面對的收視群眾都是一樣的，你播「海鮮麵竟然只有三隻蝦子」收視率看來不錯；我就立馬找「牛肉麵看不到牛肉」來跟進。所有人都掉在這個泥沼裡動彈不得。

在現今的收視環境下，無釐頭題材才有收視率，即使這是事實。大部分的觀眾也只能邊看邊罵，因為沒有其它選擇。

如果要扭轉這樣的惡性循環，公廣集團必須帶頭提供不一樣的選擇，以創業者「先猛力投資內容，開拓市場」的思維，用至少五年的公費投入，用 52 頻道這個基地，讓觀眾看到「電視新聞可以做得不一樣」：有「真正重要」的全國新聞、完整的地方新聞、更多的國際新聞，以及各種專業領域的深度報導。

公廣集團的公視、華視存在數十年，新聞播出

日久，觀眾也習以為常。但如果以專業眼光盤點，公廣集團新聞覆蓋面其實不足之處非常多，隨手舉幾個例子：

第一，公視新聞部沒有財經組，只有一、兩名財經線記者。台灣以經貿立國，公共媒體沒有專業處理財經新聞的能量，做為一間綜合性的公共媒體機構，這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第二，地方新聞人力嚴重不足，公視加上華視，兩個新聞部地方加起來，才能勉強維持都會區有三、四組記者，非都會區一、兩組。近年台灣媒體業不景氣，各機構為節約開支，都把地方記者當作優先裁減的目標。地方政、媒關係的敗壞，在行業裡幾乎成了公開的秘密。例如 2018 年花蓮爆發的「縣政府收買媒體事件」，當地記者，唯二不同流合汙的就是公視和華視。公共媒體事實上已經成了守望地方的最後一道媒體防線，但意識到此事重要性的人似乎不太多。

第三項不足的，就是國際新聞特派員。這項議題多年來行業裡談得已經夠多，只差主其事者願不願意投資，因此也就不必再多花筆墨。

除了上述三點，沒有被列舉出來的大小不足之處還有很多。筆者要強調的是，即使把公視和華視新聞部能量合在一起評估，結論都是不足而不是過剩。這才是在一篇評論文章裡提到公視新聞在行業中「沒有存在感」的真正原因之一。

當然還有其它原因，特別是員工和管理制度，但這篇文章只聚焦在資源分配，無法旁及同樣重要的員工態度和管理制度問題。但增加資源和優化人力兩件事必須一起解決，才能機會讓

公廣集團的新聞服務脫胎換骨，跟上時代。

如果要增加資源投入，那「資源」在哪裡？對這個問題，如果回頭去盤點過去六年公廣集團所有的資源——例如成立台語台、前瞻計畫資金；再加上政府投入媒體事業——例如英語新聞平台 Taiwan Plus 的錢，可以發現公廣新聞服務業務在這一波巨大的公部門投入並沒有得到顯著而有政策方向的挹注。

除了新聞部人力少有擴充，時段少有增加外，再舉一個例子：在網路、手機平台已經成為另一個主流的現實下，公廣集團對網路媒體製播的投資依舊少得可憐，最重要的只有一個「三年三千萬」的計畫。三千萬是多是少？和幾齣大戲以「億」計數的花費相比，相信公眾會有公評。

當然，也必須要說，公視新聞部內部對「公共性」的闡述，長久以來也有一些未見得準確的修辭。例如有些主張堅持：除了公視本身九億的預算以外，不應該以其它的政府補助款製作新聞或新聞性節目，否則就是昧於公共價值云云……。但這個說法本身就昧於現實：當年晨間、英語新聞開播，就是以專案補助款開播的。像「我們的島」這樣最重磅的新聞專題節目，也早就是以例如「社發基金」等專案補助款挹注製作。但即使領的是補助款，「我們的島」鈍化了嗎？向有權力者靠攏了嗎？批判力道低了嗎？當然都沒有。所以獨立性的真正的

關鍵在於「編輯室公約」的實踐，而不在於計較哪一塊錢從哪裡來。

公廣員工自己必須抓住所有資源，拿出表現說服社會「我值得被投資」的一場搏弈，而不是坐等預算上限打開再來表現。坦白說，以現今的社會氣氛和公廣這一波公關災難之後，坐等「預算開頂」的結果很可能是這個「頂」永遠打不開。

從 2018、20 年以來的幾次大選，加上接下來的公民投票，在在都能看到台灣的新聞傳播環境正在快速惡化，更不要說可能還有「認知作戰」的操弄。這些都讓人迫切感受到一個自由、多元、專業，並且能夠適應現代網路傳播環境的優質公共新聞服務的必要。

但不幸的是，恰恰就在台灣最需要的時候，也就是公廣集團新聞服務的發展極受漠視的時候。52 頻道原本可以是一個拉動公廣新聞部門的機遇，但無奈一開始選擇商業體制，就走錯了路。有很多評論者，因為公廣集團這一波幾次失誤，開始倡議索性廢除整個公廣體制。快意恩仇當然可以，但代價是台灣大部分以電視為唯一接收新聞管道的公眾，就會完全曝露在劣質資訊甚或中共認知作戰攻擊的風險裡。台灣社會擔不擔得起這種風險？想到這裡，除了努力優化、改造公廣集團的新聞服務，我們其實沒有太多選擇。

這既是對公共媒體這一份理想的期許，也是對應現實的無奈。

# 再生能源 共譜自然和諧樂章

臺灣能源有98%依賴進口，台電積極發展再生能源，推動離岸及陸域風力、太陽光電、小水力等再生能源開發計畫，並提供友善併網環境供民間業者申設綠能發電設備，朝2025年再生能源佔比20%的目標邁進。





# 臺中 安心午餐券

## 加碼至65元

### 讓孩子吃得好、吃得飽！

守護學生營養健康妥善照料  
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清寒弱勢學生

例假日、寒暑假同步發放安心午餐券，面額  
加碼到65元，可於5大超商超市兌換餐食

臺中市內貼有  
“安心午餐券守護商店”  
皆可兌換餐食



更多資訊請掃描  
QR code查詢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活動紀要

### 校園媒體識讀

從報導文學到非虛構寫作-  
新聞記者採訪寫作實務分享  
/李志遠

日期：110年10月29日 20:20-22:00  
地點：東吳大學中文系  
主辦單位：東吳大學中文系  
合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興大學新聞學系

### 校園媒體識讀

台灣新聞攝影的虛構與真實  
鄭超文

日期：110年11月23日 18:20-20:20  
地點：東吳大學中文系D0419  
主辦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協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興大學新聞學系

### 校園媒體識讀

培養優質公民力-  
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  
-線上活動-

台北場 /  
認識媒介、公民新媒體內容產製  
11/16 週六 下午14:00-18:00

講者/講題  
李志遠  
中興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尋找台灣的「非虛構故事」  
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

### 校園媒體識讀

培養優質公民力-  
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  
-線上活動-

屏東場 /  
認識媒介、防制假訊息、媒體公關  
11/19 週六 晚上19:00-21:00

講者/講題  
黃子明  
中興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新聞攝影的虛構與真實  
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

### 校園媒體識讀

培養優質公民力-  
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  
-線上活動-

彰化場 /  
認識媒介、防制假訊息、媒體公關  
11/06 週六 下午14:00-18:00

講者/講題  
吳柏軒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委員

認識真假新聞與事實查核  
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

### 校園媒體識讀

培養優質公民力-  
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  
-線上活動-

桃園場 /  
認識媒介、防制假訊息、公民新媒體內容產製、媒體公關  
10/23 週六 下午14:00-18:00

講者/講題  
林注強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委員

如何「做」出好新聞  
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探討新聞報導與「虛構故事」之間的關係。

### 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 系列講座

血汗不白流-  
你必須知道的媒體勞動權益  
陳淑諭  
台北市產業工會總幹事

記者在報導新聞時，是否曾感到「自己可憐巴巴」？是否感到「自己可憐巴巴」？是否感到「自己可憐巴巴」？

2021 12/11 13:00-17:00  
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02巷4號

### 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 系列講座

疫情下的不實訊息-  
新聞事實查核工作坊  
黃兆徵  
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總幹事

身為一線實地工作者，在真實世界採訪時，常常遇到什麼困難呢？

2021 11/8 13:00-17:00  
台北市大安區樂群路23號23樓20號-1樓

### 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 系列講座

假新聞與真團結-  
對抗假訊息與媒體工會組織發展  
鄭超文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X 張景涵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特約記者

這屆選舉事實與中心特約記者鄭超文、張景涵兩位在報導科考學生團體

2021 12/14 16:00-19:00  
國立中正大學

### 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 系列講座

團結就是力量-  
媒體工會申聯分享活動  
陳淑諭  
台北市產業工會總幹事

身為台灣的媒體工會工作者，是否曾感到「自己可憐巴巴」？

2022 1/15 13:00-17:00  
台北華山文化創意產業園區102巷4號

## 2021 記協校園媒體識讀講座系列活動

2021 年 10 月、11 月 @ 東吳大學  
 主辦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指導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x 臺師大媒體素養教育推廣計畫

## 10 月 29 日 第一場

從報導文學到非虛構寫作 -  
 新聞記者採訪寫作實務分享

李志德 /  
 鏡文學副總編輯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



李志德講師分享台灣報導文學與非虛構寫作的歷史脈絡。  
 (攝影：覃友群)



校園媒體識讀講座：從報導文學到非虛構寫作 - 新聞記者  
 採訪寫作實務分享。(攝影：覃友群)

本次講座配合國文通識課要求，為增進學生媒體識讀素養並加強採訪寫作技巧，邀請業界具有深厚採訪、編輯資歷、專長非虛構故事寫作的李志德先生擔任講師，引領初識採訪報導的學生瞭解台灣報導文學的流變，並進一步識讀新聞報導的產製過程、掌握初階寫作技巧。

講座最後的交流時間，李志德講師對於學生聽眾的諸多疑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並藉此機會將媒體工作的諸多面向分享給學生，讓他們了解每一則新聞產出背後存在的產業結構，若想改變台灣媒體商業化、政治力量干涉的關鍵還在於必須茁壯報導立場客觀的公共媒體，同時提升全民的閱聽素養。報導多少都帶入了人的觀點，我們只要確保新聞報導能夠在自由有序的環境中接受檢驗，就能夠維護它在現代公民社會應有的價值。

## 10 月 21 日 第二場

台灣新聞攝影的虛構與真實

鄭超文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聯合報攝影記者



鄭超文講師分享如何判斷新聞攝影畫面的虛實。(攝影：曾俐璋)



校園媒體識讀講座：台灣新聞攝影的虛構與真實(攝影：曾俐璋)

「電影是虛構的畫面，新聞攝影卻反映真實的人生」是人們的日常認知，然而戲如人生，新聞攝影所留下的畫面，就全然真實嗎？採訪畫面的產生，源於事件發生時的社會驅動力，還是出於政治或商業目的的擺拍？透過擁有多年一線採訪經驗的報社攝影記者鄭超文講師的解析，來增強學生識讀台灣新聞畫面的能力。

講師以許多新聞攝影圖像與學生互動，就圖像直接判斷這些攝影內容哪些是真實發生的事件，哪些又是刻意製造出來的圖片。大家以舉手方式發表感受，結果許多看起來逼真的圖像不一定真實，看起來誇張的照片也不一定是刻意製造出，辨別圖像真假不能只憑直覺。

回應學生關於媒體素養問題時，講師說明每家報紙背後都有其個別立場，大家都要清楚判斷，並對立場有所保留。以往訊息單一封閉，選擇性較少，所以不能自由去辯證消息真偽，而現在的人應做的就是多方查證，久了就不容易被帶風向。

## 2021 記協培養優質公民力－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

2021 年 10 月、11 月 @ 線上

主辦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指導單位：台北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x 廣電媒體素養公民培力推廣合作



2021 培養優質公民力－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活動由記協會長鄭超文(左)開場。(圖：活動截圖)

台北場 2021 年 10 月 16 日

研習議題：認識媒介、公民新媒體內容產製  
講 師：李志德 /  
鏡文學副總編輯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

### 尋找台灣的「非虛構故事」

新聞報導是一面面鏡子，反映出人生的百味，有時精彩的像一篇文學小說，卻又不是小說，它是「非虛構故事」。擁有多年採訪經驗與深厚撰寫功力的新聞記者，帶你尋找屬於台灣、屬於我們身邊的「非虛構故事」，從中瞭解新聞寫作與產製的過程，重新認識好新聞的價值。



桃園場講座由林注強講師帶領新住民了解網路新聞的問責機構(圖：活動截圖)

桃園場 2021 年 10 月 23 日

研習議題：認識媒介、防制假訊息、  
公民新媒體內容產製、媒體公關  
講 師：林注強 /  
台視駐桃園記者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委員

### 如何「做」出好新聞

每天在電視上、網路中、報紙裡看到的新聞是如何「做」出來的？怎麼樣的新聞算得上是好新聞呢？新聞背後傳達了哪些訊息？如何辨識裡面的真假呢？從業多年的地方電視台記者帶你認識真正的新聞生產流程，了解媒體在公眾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未來你也能成為讀懂新聞的好公民。

社會大眾的新聞識讀能力關乎公民素養，是公民社會最重要的基礎之一，因此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基於媒體工作者的良知良能，秉持推動媒體改革、新聞自由的精神，年年舉辦媒體識讀講座，透過現職記者的經驗與實務，從新聞製作的源頭，協助民眾認識媒體、解讀新聞，並從中學習判斷新聞資訊，提升優質公民力。

去(2020)年度，記協在大學校園舉辦媒體識讀講座，受到廣大師生的熱烈迴響，2021 年記協主動與地方新住民團體合作，走訪全台各地，為在地民眾與新住民提升新聞視野。

由資深新聞工作者透過媒體識讀相關案例分析，例如影片、照片以及實際工作經驗等，讓新住民與在地民眾了解新聞的產製過程與方法，也識讀其中可能產生的偏差，並就「媒體應該如何報導新聞與民眾如何讀看新聞」為題，從不同面向切入，與現場聽眾進行交流與對談。



屏東場講座由黃子明講師帶領新住民學習新聞攝影的虛構與真實(圖：活動截圖)

彰化場 2021 年 11 月 06 日

研習議題：認識媒介、公民新媒體內容產製  
媒體公關  
講 師：吳柏軒 /  
自由時報生活記者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委員

### 認識真假新聞與事實查核

網路時代資訊爆炸，科技電腦工具及軟體日新月異，加上政治選舉、商業利益、犯罪活動等幕後操作，連當代新聞也容易蒙上造假陰影，民眾又該如何辨識眼前中的新聞是不是「新聞」？可透過文字結構、照片解析，加上理解科技工具，找出傳播平台背後組織架構等，亦能集結眾人之力，觸及事實查核，藉此分辨真假，建立個人判斷。



彰化場講座由吳柏軒講師帶領新住民認識真假新聞與事實查核(圖：活動截圖)

屏東場 2021 年 11 月 19 日

研習議題：認識媒介、防制假訊息、媒體公關  
講 師：黃子明 /  
中國時報資深攝影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監察委員

### 新聞攝影的虛構與真實

新聞影像所帶來的視覺衝擊，時常影響我們對事件的判讀。但你眼前所聞所見的都是真實的嗎？在資深攝影記者的眼裡，影像的真假可以從細微的表現中讀出。今日要辨別來自新聞媒體的真假訊息，影像在當中扮演了什麼角色，又如何受到廣告宣傳的影響，值得我們好好來探究一番。

## 「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系列講座



場次一  
2021.12.11@ 亞杰視角

講師：陳淑綸 /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  
活動對象：媒體工作者  
協辦單位：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陳淑綸講師帶領媒體工作者了解自己的勞動權益。  
(攝影：鄭超文)

### 血汗不白流—你必須知道的媒體勞動權益

記者經常報導別人勞動權益受損，但自己可曾想過「是否處於良好的勞動環境」裡？勞基法對記者的保障有哪些？關於勞動權益、性別平等、職業災害、職場霸凌……許多面向，究竟又是什麼？如果記者自己不深入了解，同樣是權益受損的一方。這場關於媒體從業人員的勞動權益講座，邀請講師陳淑綸（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帶領媒體工作者，親自做一次「勞動權益小體檢」，讓你更懂得保護自己的工作權。



張景涵講師與傳播科系同學分享對抗錯假訊息的實際操作方法。(攝影：黃百禾)



鄭超文講師與傳播科系同學分享台灣媒體工會組織的歷史。(攝影：黃百禾)

場次二  
2021.12.14@ 國立中正大學

講師：張景涵 /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特約記者  
鄭超文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會長  
活動對象：新聞傳播相關科系在校學生  
管中祥老師「傳播倫理課程」  
協辦單位：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

### 假新聞與真團結— 對抗錯假訊息與媒體工會組織發展

記協邀請事實查核中心特約記者張景涵，指導在校傳播科系學生實際操作如何對抗錯假訊息，以培植未來業界工作的基本能力。為了使學生更能了解台灣的業界實務，並埋下未來維護產業勞權環境的種子，記協會長鄭超文先生將為學生講解台灣媒體工作組織發展的歷史與展望。

活動日期：2021年12月~2022年01月  
主辦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贊助單位：國際記者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場次三  
2022.01.08@ 書屋花甲 - 台大店

講師：黃兆徽 /  
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教育總監  
活動對象：媒體工作者、大傳科系在校生  
協辦單位：台灣事實查核教育基金會



黃兆徽講師與來賓分享如何應對疫情下的不實訊息。(攝影：賴昀)

### 疫情下的不實訊息—新聞事實查核工作坊

身為一線媒體工作者，在核實新聞訊息時，常常遇到什麼困境呢？今年台灣 covid-19 疫情乍起，報導有關疫情的新聞，又該如何避免不實訊息的干擾？記協邀請專業講師，與您分享對抗假訊息的經驗和查證方法，並透過實作課程互相交流，加強媒體工作者的專業能力、共同思索對抗假訊息的解方。



媒體工會工作者分享工會的現景與目標。(攝影：賴昀)

場次四  
2022.01.15@ 亞杰視角  
講師：陳淑綸 /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  
活動對象：媒體工會工作者  
協辦單位：台北市產業總工會

### 團結成就力量—媒體工會串聯分享活動

身為台灣的媒體工會工作者，是否常覺得孤掌難鳴，或無處尋求同業支持？疫情之下的媒體環境，有哪些目標可以成為團結努力的新方向？本次活動邀請熟悉工會組織活動的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與大家逗陣，藉由現場互動分享，加強工會間聯繫，也要共同擘畫台灣媒體工會運動的藍圖新貌。

## 2021 台灣媒體工作者勞動權利暨錯假訊息影響調查結果分析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國際記者聯盟 (IFJ) 贊助

報告發布時間：2022 年

### 執行方式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受國際記者聯盟贊助，執行於 2021 年 12 月，透過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及臺北市新聞從業人員職業工會會員通訊、記協 Facebook 粉絲專頁、記者聯誼會、各種媒體工會及通訊電子報管道，發出「2021 年台灣新聞記者權利調查」問卷，以線上填答的方式，調查 2021 年台灣新聞媒體工作者勞動權利狀態，特別著重於媒體工作者在 2021 年 5 月台灣爆發本土疫情時，工作權利是否受到應有的保護。本次調查主題為「台灣媒體工作者錯假訊息影響調查」，期望藉以勾勒出第一線記者遇到錯假訊息時面對的挑戰，為此新興的全球化問題做好準備。

問卷填寫期間為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2 月 8 日，共回收 78 份問卷，回收份數較前一年增加 24%。

### 問卷設計

本次問卷以前一年度「2020 年台灣新聞記者權利調查」為基礎修改，著重於疫情下勞動問題的展現，並新增錯假訊息對新聞工作影響的情況。

最終施測的問卷共 26 題：其中，受訪者基本資料（包括任職媒體類型、年資等）的題組有 8 題，針對過去一年媒體工作者權利情況與勞動意識評價的調查題組共有 10 題，有關錯假訊息影響媒體工作的題組有 8 題。

### 調查結果分析

#### 1. 基本資料

本問卷總計 78 人填答。

依年齡區分，包括：20-29 歲 12 人 (15.3%)、30-39 歲 23 人 (29.4%)、40-49 歲 18 人 (23%)、50-59 歲 21 人 (26.9%)、60-69 歲 3 人 (3.8%)，及 70 歲以上 1 人 (1.2%)。

依性別區分，包括：女性 29 人 (37.1%)、男性 49 人 (62.8%)。

依主要服務的媒體類型區分，包括：電視台 31 人 (39.7%)、網路媒體 23 人 (29.4%)、服務於多種媒體 8 人 (10.2%)、報紙 4 人 (5.1%)、廣播電台 4 人 (5.1%)、雜誌 4 人 (5.1%)、社群媒體 2 人 (2.5%)，及倡議型媒體 2 人 (2.5%)。

依目前任職媒體單位的性質區分，包括：大型商業媒體 37 人 (47.4%)、公共媒體 13 人 (16.6%)、小型商業媒體 11 人 (14.1%)、非營利媒體 9 人 (11.5%)、其他 8 人 (10.2%)。

依職位與職務區分，包括：記者 25 人 (32%)、影音或工程技術人員 12 人 (15.3%)、攝影記者 11 人 (14.1%)、採訪或編輯部門主管 10 人 (12.8%)、獨立記者 5 人 (6.4%)、編輯 4 人 (5.1%)、製作人 2 人 (2.5%)、主播 1 人 (1.2%)、其他 8 人 (10.2%)。

依在媒體業工作年資總和區分，包括 20 年以上 31 人 (39.7%)、10 年以上未滿 20 年 17 人 (21.7%)、0 到 4 年 15 人 (19.2%)，及 5 年以上未滿 10 年 15 人 (19.2%)。

依是否為媒體工會（如記者協會、企業工會、職業工會）的成員區分，包括：有參與媒體工會 53 人 (68%)，無參與媒體工會 25 人 (32%)。回答未加入工會的影響因素，主要為：沒有注意到有工會組織 19 人 (44.1%)、其他原因 11 人 (25.5%)、怕受到上司或同業關注 9 人 (20.9%)、我覺得我的工作權益沒問題 9 人 (20.9%)、我覺得工會無法協助我的問題 8 人 (18.0%)、需要額外出會費 8 人 (18.0%)、別人參加工會曾發生不好的後果 2 人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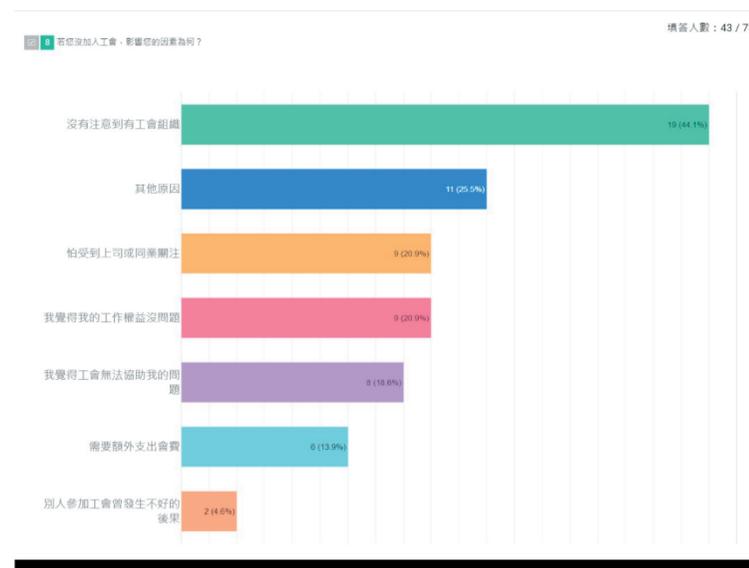


圖 1：若您沒加入工會，影響您的因素為何？

## 2.2021 年台灣媒體工作者勞動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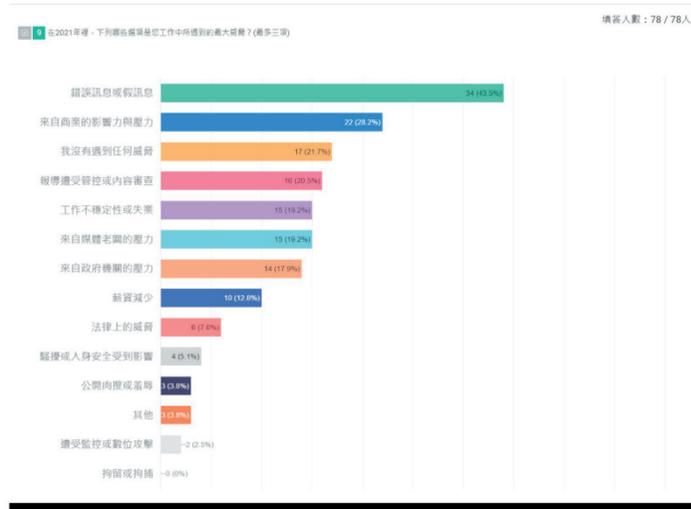


圖 1：2021 年裡，填答者在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威脅

在過去一年中，新聞媒體工作者在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威脅（最多選三項），依序分別是「錯誤訊息與假訊息」占 43.5%、「來自商業的影響力與壓力」占 28.2%、「報導遭受管控或內容審查」占 20.5%、「工作不穩定性或失業」占 19.2%、「來自媒體老闆的壓力」占 19.2%、「來自政府機關的壓力」占 17.9%、「薪資減少」占 12.8%。其餘占 10% 以下威脅分別有「法律上的威脅」、「騷擾或人身安全受到影響」、「公開肉搜或羞辱」、「遭受監控或數位攻擊」、及「其他」。值得欣慰的是，也有為數不少的填答者認為「我沒有遇到任何威脅」（占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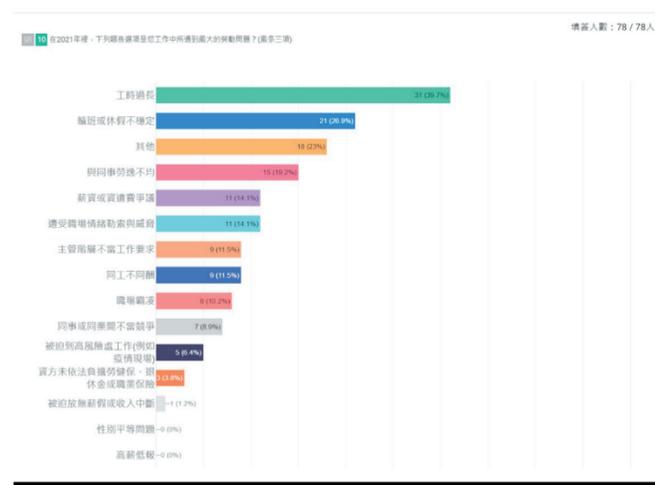


圖 2：2021 年裡，填答者在工作中所遇到最大的勞動問題

在過去一年中，新聞媒體工作者在工作中所遇到最大的勞動問題（最多選三項），依序分別是「工時過長」占 39.7%、「輪班或休假不穩定」占 26.9%、「與同事勞逸不均」占 19.2%、「薪資或資遣費爭議」占 14.1%、「遭受職場情緒勒索與威脅」占 14.1%、「主管階層不當工作要求」占 11.5%、「同工不同酬」占 11.5%、「職場霸凌」占 10.2%。其餘占 10% 以下威脅分別有「同事或同業間不當競爭」、「被迫到高風險處(例如疫情現場)工作」、「資方未依法負擔勞健保、退休金或職業保險」、「被迫放無薪假或收入中斷」等。

關於 2021 年裡遇到的勞動問題，自由開放填寫部分則反映以下問題。

升遷調薪制度方面，填答者表示：「調薪制度不健全與考績審核不透明，攝影器材、電腦設備老舊，進而影響工作效率和播出品質。」、「沒有完善加薪升遷制度，導致本行業要經由不斷換公司來增加薪酬，很本末倒置。」、「獨立工作者的稿費數十年不變，沒有薪柴怎麼生起旺盛的火焰？」、「希望媒體記者薪資可以更高」。

疫情影響(含工時)方面，填答者表示：「因疫情關係，能承攬的文字案件減少。」、「公司新聞部門因行政疏失，未被列入疫苗優先施打對象。」、「疫情期間，確診病例隨時在增加，雖然說已經下班，可是有事時候，總公司還是一直問，幾乎隨時要盯著手機訊息，深怕錯過最新疫情，所以雖然下班，可是到睡覺前都很緊繃，其實大家都是這樣，沒甚麼抱怨，只是有點無奈。」  
 訊息輿論方面，填答者表示：「被匿名網軍(粉專、PTT、IG)公開辱罵，希望資方能編預算提供記者提告。」、「對網軍充斥帶風向深感憂慮」

## 3.2021 年台灣媒體工作者面臨的疫情風險

台灣 2021 年 5 月本土疫情乍起，為瞭解是否因此對於媒體工作者人身安全、勞動環境產生很大的衝擊，本次問卷擬定 5 題相關問題，期望能反映媒體工作者在受疫情影響的真實情況。

2021 年 5 月起台灣疫情高峰期，雇主因此為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安全做過何種安排？以「分流上班」占 61.5% 最高，其次依序為「居家工作」占 47.4%、「提供採訪現場時的防護裝備」、「安排盡早施打疫苗」占 26.9%、「不強制到高風險區域採訪」占 17.9%、「提供帶薪疫苗假」占 16.6%，其餘低於 10% 以下的因素包括「雇主沒有在疫情其為我加強工作安全」、「須隔離或自主管理時提供帶薪假或請假彈性(不影響考績)」、「其他」、「因供需隔離時雇主有負擔相關費用」。值得注意的是，仍有 8.9% 填答者認為「雇主沒有在疫情期為我加強工作安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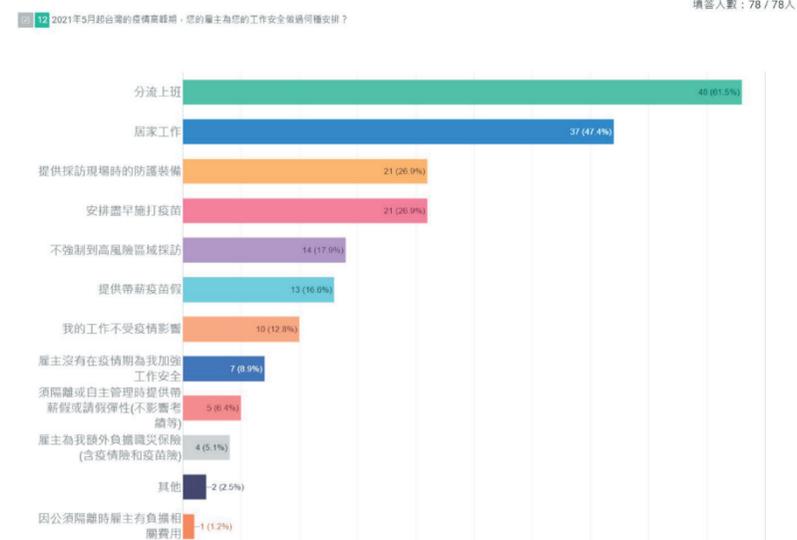


圖 3：2021年5月起台灣疫情高峰期，雇主為工作安全做過何種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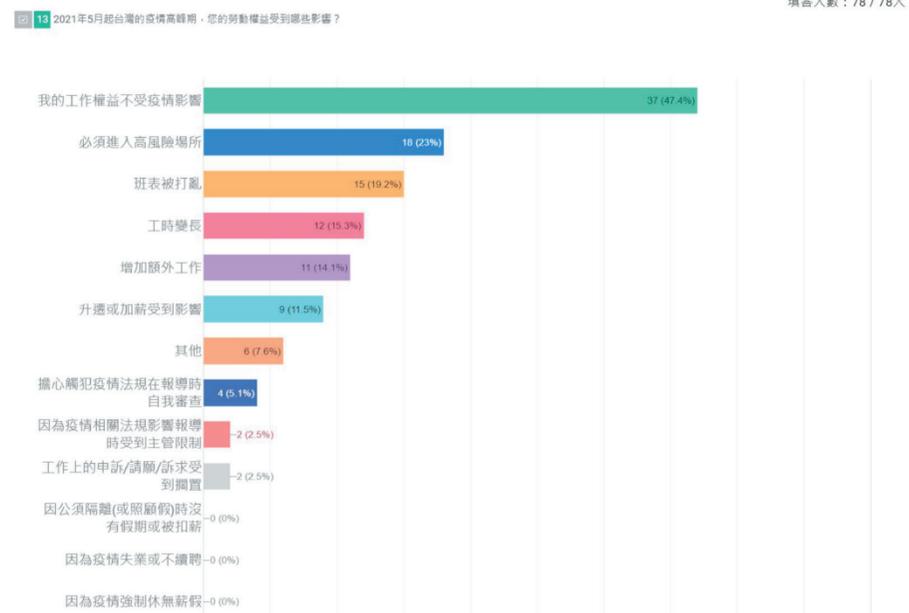


圖 4：2021年5月起台灣疫情高峰期，填答者的勞動權益受到那些影響？

整體來說，在 2021 年 5 月起的台灣疫情高峰期，填答者認為自己的勞動權益受到哪些影響？值得欣慰的是，許多填答者認為「我的工作權益不受疫情影響」37 人 (47.4%)，其次依序為「必須進入高風險場所」(23%)、「班表被打亂」(19.2%)、「工時變長」(15.3%)、「增加額外工作」(14.1%)、「升遷或加薪受到影響」(11.5%)，占比 10% 以下的選項有「其他」、「擔心觸犯疫情法規在報導時自我審查」、「因為疫情相關法規影響報導時受主管限制」、「工作上的申訴/請願/訴求受到擱置」。



圖 5：2021年5月起台灣疫情高峰期，填答者施打疫苗影響哪些工作權益？

在疫情相關的工作權益中，在 2021 年 5 月起的台灣疫情高峰期，填答者認為自己因施打疫苗影響了哪些工作權益？多數填答者認為「我的工作風險不高，不須第一時間施打疫苗」26 人 (33.3%)，其次依序為「政府沒有及時安排我施打疫苗，導致我必須面臨工作風險」(19.2%)、「施打第一劑疫苗後，卻因各種因素拖延施打第二劑疫苗」(19.2%)、「其他」(17.9%)、「政府沒有及時安排我施打疫苗，導致我必須面臨工作風險」(12.8%)、「我的媒體不在造冊施打的名單內，卻必須面臨工作風險」(10.2%)，占比 10% 以下的選項有「我因為施打疫苗不適，卻無法請疫苗假」、「雇主強制安排我施打疫苗，否則會影響工作權利」、「雇主安排我施打疫苗，卻無法選擇疫苗廠牌」等。

回答關於就填答者所知，2021 年身邊有多少認識或不認識的同業，不排除因公染疫 (包含死亡)？多數填答者回答「5 人以內」(73 人，93.5%)，部分認為有「5-10 人」因公染疫 (5 人，6.4%)。

關於 2021 年疫情高峰期遇到的勞動問題，自由開放填寫部分則反映以下問題。

疫情風險方面，填答者表示：「應該關心第一線媒體工作者所處的環境及防護設備的支援」、「媒體工作者染疫處理尚無 SOP，染疫後清消工作雖暫無疑慮，但清消後持續回到原工作場域」等等。

疫苗施打方面，填答者表示：「第一劑疫苗是有公司同仁疑似感染身故，政府機關才將第一線新聞從業人員納入優先施打名單，第二劑則是過了建議施打期，符合第二劑資格後自行上網預約」、「政府疫苗類別涵蓋不完全，前線記者有疫苗可打，但後勤人員卻遲至半年後才有辦法施打，後勤人員也是常接觸到外來上節目來賓等等人員，同棟公司出入分子也相對複雜」、「在全傳媒工會爭取下文化部（平面及網路媒體）及 NCC（電子媒體）有通知公司造冊讓一線媒體工作者先打疫苗，可惜沒有在三月時就採納工會建議，媒體工作者直到七月才施打到疫苗，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風險甚至傷亡」。

其他與疫情相關方面，填答者表示：「疫情導致比較大的問題在於各部會對記者（尤其是獨立記者）採訪加以限制，如關閉記者室或只允許線上採訪」、「想建議或疑問指揮中心，卻被主管認為替指揮中心添麻煩，不要有任何意見」等等。

#### 4. 對自我與雇主勞動權益的主觀評價

本問卷填答者 78 位中，有超過半數 (53 人，67.9%) 是媒體工會的一員，問卷亦調查填答者自我勞動和填答者眼中雇主勞動意識的評價，最高為 10 分、最低為 0 分。

調查結果為：「對自我勞動權利意識評分」眾數為 8、「對雇主勞動權利意識評分」眾數為 5。

#### 5. 新聞自由干預與不實訊息影響

本次問卷次主題為不實訊息對新聞現場工作的影響，值得慶幸的是，在「2021 年裡，您是否曾經遭到本國政府不當干預您的新聞工作」題中，多數填答者答覆為「否」(53 人，67.9%)，其次依序為「不清楚」(13 人，16.6%)、「是」(12 人，15.3%)，與國際對台灣新聞自由指數的評比大致相符。

回答「2021 年裡，您是否曾經遭到外國政府不當干預您的新聞工作」問題中，多數填答者答覆為「否」(67 人，85.8%)，其次依序為「不清楚」(8 人，10.2%)、「是」(3 人，3.8%)，認為外國政府干預新聞報導的填答者認為，這些外國政府指的是中國 (2 人)、美國 (1 人)。

回答「2021 年裡，錯假訊息是否曾造成工作時被誤導，或必須花費較多時間追蹤查證」問題中，多數填答者答覆為「是」(50 人，64.1%)，其次依序為「否」(20 人，25.6.2%)、「不清楚」(8 人，10.2%)，顯見錯假訊息核實相較於以往，對新聞工作產生更多干擾。



圖 6：常見的錯假訊息來自哪裡？

關於最常接收到錯假訊息的來源管道，前三名的選項為「FB、推特、IG 或各種社群網站訊息」(63.9%)、「LINE、微信或各種通訊軟體訊息(含群組訊息)」(59%)、「境外(含中國)網站訊息」(47.5%)，其他依序為「國內網站訊息」、「PTT、Dcard 或各種討論網站」、「境外(含中國)新聞網站」、「國內新聞網站」、「同業或消息來源的訊息傳遞」、「壹讀、每日頭條或各種內容農場網站」、「其他」等。

在訊息查核方式的使用中，多數填答者使用「Google 等搜尋引擎找關鍵字或以圖搜圖」(61.5%)、「聯繫當事人或相關人驗證」(60.2%)、「問身邊的人或是同業」(48.7) 核實訊息，其次依序為「查核訊息源頭(如國外網站)」、「事實查核中心、MyGoPen、Cofacts 等查核網站報告」、「聯繫各種報告消息來源」、「其他」等等。

在境外訊息干預部分，問題「2021 年裡，你認為來自境外(含中國)錯假訊息是否有影響新聞工作？」最高(影響最大)為 10 分、最低(影響最低)為 0 分調查結果為眾數 2，亦即影響尚不深遠，或可說，社交媒體上的假訊息，對專業媒體工作者影響不大。

關於錯假訊息與新聞查核的問題，自由開放填寫部分則反映以下問題。

在查核實行方面，填答者認為：「新聞巨量、人力不足、事實查核有執行上的困難」、「台灣過多

來源不明農場文，在未經查證前提下，常常遭網路媒體引用，以致積非成是的狀況」。

在建立信任感方面，填答者認為：「群組流傳的錯假訊息目標就是要你花力氣去澄清擾亂社會，需要國家和社會大眾有意識的建立對媒體機構的信任，媒體機構和工作者也有自己是對抗假訊息第一線戰士的認知，必須認真看待自己的工作」。

在與政府有關方面，填答者認為：「政府也常放錯誤訊息」、「指揮中心跟同事有好的關係，在等待回復(查核)時，已經先給同事了」。

#### (四) 小結：權利倡議行動及策略建議

##### 1. 媒體工作的勞動工時過長需改善及受到關注

無論是否受到疫情影響，媒體工作者普遍存在工時過長或輪班不穩定現象，在本土疫情高峰期時，許多負責疫情專門路線的記者工作負荷量更大，幾乎 24 小時待命，無一刻放鬆，長期下來對身心健康都是很大的考驗。工時過長的媒體工作者，其專業表現也會受到影響，就長遠公共利益而言，媒體工作者有好的勞動環境，才能給社會更好的新聞品質。建議 NCC 換發電視頻道執照時，應將一線工作人員的勞動環境列入考量。

##### 2. 莫讓商業影響記者報導新聞的自由

長久以來，台灣的新聞報導自由經由商業(廣告業務)影響的方式受到箝制，其中也不乏政黨政治、地方政府的勢力，因此各家新聞媒體意識形態濃厚，不受大眾信賴，為人詬病。在本次問卷調查中，許多填答媒體同業認為「來自商業的影響與壓力」是對媒體工作的一大威脅，媒體雇主應推動「編輯室公約」的簽訂與落實，實現記者報導新聞的自主性。

##### 3 錯假訊息對媒體工作的影響不容忽視

問卷中顯示媒體工作者認為「錯誤訊息或假訊息」是對媒體工作的一大威脅，而錯假訊息管道多元、變化豐富、真假摻雜、立場與事實難以區別，在自媒體興盛且訊息傳遞快速的如今，都讓新聞工作備受挑戰。新聞工作者時常迫於時間壓力，對訊息核實不全時，影響工作表現專業度，所以無論是改善媒體同業的勞動壓力或是增加工作者辨識錯假訊息的專業能力，都是媒體業刻不容緩的重要目標。

##### 4. 建立大眾與政府對媒體的尊重與信賴感

長久以來，台灣公務機構、民眾、媒體之間未能建立彼此的信賴感。公務單位對記者報導新聞的自主性認識不足、媒體受商業利益箝制而無法落實新聞自由、民眾無法信賴媒體記者，產生惡性循環結構，媒體工作者長期下來也因專業不受尊重而自信低落。呼籲政府應修正新聞揭露商業利益的相關法條、媒體雇主應注重改善媒體勞動環境、民眾應透過媒體識讀教育來認識並支持良好的新聞品質，重建媒體勞動者實踐新聞倫理的動力。

##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假新聞四處流傳、媒體業走下坡..... 新聞工作者的 2021 年過得還好嗎？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受國際記者聯盟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IFJ) 贊助，在 2021 年 12 月進行「2021 年台灣新聞記者權利調查」，結果顯示在過去一年中，新聞媒體工作者在工作中所遇到的最大威脅是「錯誤訊息與假訊息」。在疫情採訪方面，接近四分之一的受訪者為自己「必須進入高風險場所」擔心，近兩成的受訪者表示因為疫情使得「班表被打亂」。

本次調查以「台灣媒體工作者錯假訊息影響調查」為主題，探討議題包括四部分：

- 一、媒體工作者在新聞專業方面的挑戰
- 二、媒體工作者一般勞動權益狀況
- 三、媒體工作者面臨的疫情風險及因應之道
- 四、媒體工作者在疫情下的勞動權益

每道問題答案均可複選，最多選擇三項。

首先，在過去一年中，新聞媒體工作者在工作專業上中所遇到的最大威脅是什麼？

43.5% 的受訪者選擇「錯誤訊息與假訊息」，28.2% 的受訪者選擇「來自商業的影響力與壓力」，20.5% 的受訪者選擇「報導遭受管控或內容審查」。另外，選擇「工作不穩定性或失業」和「來自媒體老闆的壓力」各有 19.2%。

此外還包括「來自政府機關的壓力」、「薪資減少」、「法律上的威脅」、「騷擾或人身安全受到影響」、「公開肉搜或羞辱」、「遭受監控或數位攻擊」等。

進一步探索不實訊息的影響，關於最常接收到錯假訊息的來源管道，前三名的選項為「FB、推特、IG 或各種社群網站訊息」(63.9%)、「LINE、微信或各種通訊軟體訊息(含群組訊息)」(59%)、「境外(含中國)網站訊息」(47.5%)。其他還有「國內網站訊息」、「PTT、Dcard 或各種討論網站」、「境外(含中國)新聞網站」等。

若需要查核訊息，多數填答者使用「Google 等搜尋引擎找關鍵字或以圖搜圖」(61.5%)、「聯繫當事人或相關人驗證」(60.2%)、「問身邊的人或是同業」(48.7%)。

不過被問道「2021 年裡，你認為來自境外(含中國)錯假訊息是否有影響新聞工作？」最高(影響

最大)為 10 分、最低(影響最低)為 0 分。調查結果為眾數 2，亦即影響尚不深遠，或可說，社交媒體上的假訊息，對專業媒體工作者影響不大。

此外，被問道「您是否曾經遭到本國政府不當干預您的新聞工作」，多數填答者答覆為「否」(53 人，67.9%)，其次依序為「不清楚」(13 人，16.6%)、「是」(12 人，15.3%)，與國際對台灣新聞自由指數的評比大致相符。

關於錯假訊息與新聞查核的問題，自由開放填寫部分則包括：「新聞巨量、人力不足、事實查核有執行上的困難」、「台灣過多來源不明農場文，在未經查證前提下，常常遭網路媒體引用，以致積非成是的狀況」。

對政府的角色，有填答者認為：「政府也常放錯誤訊息」、「指揮中心跟同事有好的關係，在等待回復(查核)時，已經先給同事了」。

其次，問道在過去一年中新聞媒體工作者在工作中所遇到最大的勞動問題，39.7% 的受訪者選擇「工時過長」，26.9% 選擇「輪班或休假不穩定」占，19.2% 有「與同事勞逸不均」問題，出現「薪資或資遣費爭議」的有 14.1%。

其它還有「遭受職場情緒勒索與威脅」、「主管階層不當工作要求」、「同工不同酬」和「職場霸凌」等。

問卷也提供開放式填答，收到的內容包括：「因疫情關係，能承攬的文字案件減少。」、「公司新聞部門因行政疏失，未被列入疫苗優先施打對象。」、「疫情期間，確診病例隨時在增加，雖然說已經下班，可是有事時候，總公司還是一直問，幾乎隨時要盯著手機訊息，深怕錯過最新疫情，所以雖然下班，可是到睡覺前都很緊繃，其實大家都是這樣，沒甚麼抱怨，只是有點無奈。」

在訊息輿論方面，填答者表示：「被匿名網軍(粉專、PTT、IG)公開辱罵，希望資方能編預算提供記者提告。」、「對網軍充斥帶風向深感憂慮」

2021 年 5 月起台灣本土疫情升溫？問卷以五道題目詢問疫情流行對新聞工作有什麼影響。

首先，雇主為媒體工作者的工作安全做過何種安排？結果顯示 61.5% 的受訪者「分流上班」，佔比最高。47.4% 為「居家工作」，「提供採訪現場時的防護裝備」、「安排盡早施打疫苗」各有 26.9%。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 8.9% 填答者認為「雇主沒有在疫情期為我加強工作安全」。

被問道自己的工作權益有沒有受到疫情影響？47% 的受訪者認為「我的工作權益不受疫情影響」，23% 擔心「必須進入高風險場所」，19.2% 認為自己「班表被打亂」、14~15% 認為「工時變長」、「增加額外工作」。但也有受訪者「擔心觸犯疫情法規在報導時自我審查」、「因為疫情相關法規影響報導時受主管限制」、「工作上的申訴/請願/訴求受到擱置」。

綜合上述調查結果，記協提出四點權利倡議：

一、媒體工作的勞動工時過長需改善及受到關注，媒體工作者普遍存在工時過長或輪班不穩定現象，在本土疫情高峰期時，許多負責疫情專門路線的記者工作負荷量更大，幾乎 24 小時待命，無一刻放鬆，長期下來對身心健康都是很大的考驗。工時過長的媒體工作者，其專業表現也會受到影響。建議 NCC 換發電視頻道執照時，應將一線工作人員的勞動環境列入考量。

二、長久以來，台灣的新聞報導自由經由商業(廣告業務)影響的方式受到箝制，其中也不乏政黨政治、地方政府的勢力，因此各家新聞媒體意識形態濃厚，不受大眾信賴，為人詬病。媒體雇主應推動「編輯室公約」的簽訂與落實，實現記者報導新聞的自主性。

三、問卷中顯示媒體工作者認為「錯誤訊息或假訊息」是對媒體工作的一大威脅，而錯假訊息管道多元、變化豐富、真假摻雜、立場與事實難以區別。所以無論是改善媒體同業的勞動壓力或是增加工作者辨識錯假訊息的專業能力，都是媒體業刻不容緩的重要目標。

四、長久以來公務單位對記者報導新聞的自主性認識不足、媒體受商業利益箝制而無法落實新聞自由、民眾無法信賴媒體記者，產生惡性循環結構。記協呼籲政府應修正新聞揭露商業利益的相關法條、媒體雇主應注重改善媒體勞動環境、民眾應透過媒體識讀教育來認識並支持良好的新聞品質，重建媒體勞動者實踐新聞倫理的動力。

本次調查問卷填寫期間為 2021 年 12 月 27 日至 2022 年 2 月 8 日，共回收 78 份問卷。受訪者服務的媒體類型區分，包括：電視台 31 人(39.7%)、網路媒體 23 人(29.4%)、服務於多種媒體 8 人(10.2%)、報紙 4 人(5.1%)、廣播電台 4 人(5.1%)、雜誌 4 人(5.1%)、社群媒體 2 人(2.5%)，及倡議型媒體 2 人(2.5%)。

依目前任職媒體單位的性質區分，包括：大型商業媒體 37 人(47.4%)、公共媒體 13 人(16.6%)、小型商業媒體 11 人(14.1%)、非營利媒體 9 人(11.5%)、其他 8 人(10.2%)。

##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第十六屆會員大會暨改選

活動日期：2022年4月23日  
活動地點：亞洲視角  
主辦單位：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於2022年4月23日（星期六）上午10點00分，在亞杰視角舉行第十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會中選舉第十六屆執行委員、監察委員等幹部，並報告會務。

本次會員大會也舉辦勞工教育活動，邀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陳淑綸總幹事蒞臨演講，講題：新聞兼職人員勞動權益須知講座。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十六屆會員大會會務報告。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第十六屆理監事改選。

### / 幹部改選

#### 新任幹部名單

會長	鄭超文	聯合報攝影記者
常務理事	李志德	鏡周刊文化組副總編輯
常務理事	吳柏軒	自由時報記者
理事	安德毅	獨立記者
理事	黃以敬	台北時報總編輯
理事	游婉琪	獨立記者
理事	楊智強	報導者記者
理事	賴 昀	轉角國際編輯
理事	羅玉潔	道瓊特約台灣財經報導與英文新聞編譯 / 撰稿人

常務監事	林注強	台視駐桃園記者
監 事	徐建豐	蘋果新聞網南部採訪組主任
監 事	黃子明	中國時報主任記者

候補理事	鄧佩儒	中央社記者
候補理事	馬小蘭	獨立記者

### / 工作成果報告



## 參加 2022 年國際記者聯盟 (IFJ) 第 31 屆會員大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Congress) in Oman-Muscat



與會代表大合照 (攝影：IFJ 大會)

活動日期：2022 年 5 月 31 日 ~6 月 3 日  
活動地點：阿曼 / 馬斯喀特 / JW Marriott Muscat  
主辦單位：國際記者聯盟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IFJ)  
協辦單位：Omani Journalists Association

台灣記者協會派理事游婉琪代表，前往阿曼參加 2022 年國際記者聯盟 (IFJ) 第 31 屆會員大會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Journalists World Congress，期間除了參與 FAPAJ (Federation of Asia-Pacific Journalists) 籌組成立、於大會發言參與議程討論和表決、以及接受阿曼電視台採訪外，更代表台灣參加第 31 屆 IFJ 執行委員會選舉，並入選為後備執行委員 (General Reserve Advisers)。



台灣記協理事游婉琪參選 IFJ 執委會並上台發表政見，強調台灣過去長年在新聞自由與捍衛採訪權益的貢獻 (攝影：IFJ 大會)



台灣記協理事游婉琪 (中) 參與 FAPAJ (Federation of Asia-Pacific Journalists) 幹部表決 (攝影：IFJ 大會)

本次會議為 IFJ 依照章程每三年舉辦一次之全球代表大會，共有超過 130 個國家共約 300 位會員代表與會。議程包含章程修改、審查年度區域活動報告與預算審計、承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UNESCO 與其他國際組織合作委辦事項，新聞自由安全基金決算，以及選舉新任會長與執行委員會委員等會務幹部。

會中，台灣記協理事游婉琪代表台灣登記參選執行委員會，並於政見發表會中，強調記協長年擔任 IFJ 幹部與貢獻。雖然這是游婉琪第一次參加 IFJ 活動及參選，最後並未順利當選。但仍然於 30 位來自全球各地的參選人中，拿下 83 票，成為後備執行委員 (General Reserve Advisers)。未來一旦正選的執委因故無法參加 IFJ 重要活動，將由後備執委代表參選。

亞太區被選為的執委的 Adam Portelli，來自澳洲的 Media Entertainment and Arts Alliance，也於選舉結果出爐後第一時間表達希望能與台灣記協合作，在香港新聞自由與獨立新聞工作者議題上共同努力發聲。

後續，台灣記者協會也持續和來自亞洲國家其他地區的記者組織代表保持密切聯繫，預計將於今年年底共同籌辦東亞與東南亞區的區域會議，商討亞洲國家新聞媒體所面臨的挑戰與解方。(撰文：游婉琪)



台灣記協理事游婉琪 (中) 接受阿曼當地電視台採訪 (攝影：IFJ 大會)

**選箱配 最優惠 48元起**

國內包裹、快捷寄到 i 郵箱取件，給您最強優惠！

認識 i 郵箱

i 郵箱據點

**託運單**

106409  
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55號  
Agus Pagan 0989-000-000

106824  
收件地址：北捷東門站 i 郵箱  
收件人：Maua Lubis 收  
行動電話：0912-345-678



窗口寄件 到 i 郵箱



收到簡訊 i 郵箱取件

輸入手機末3碼 + 取件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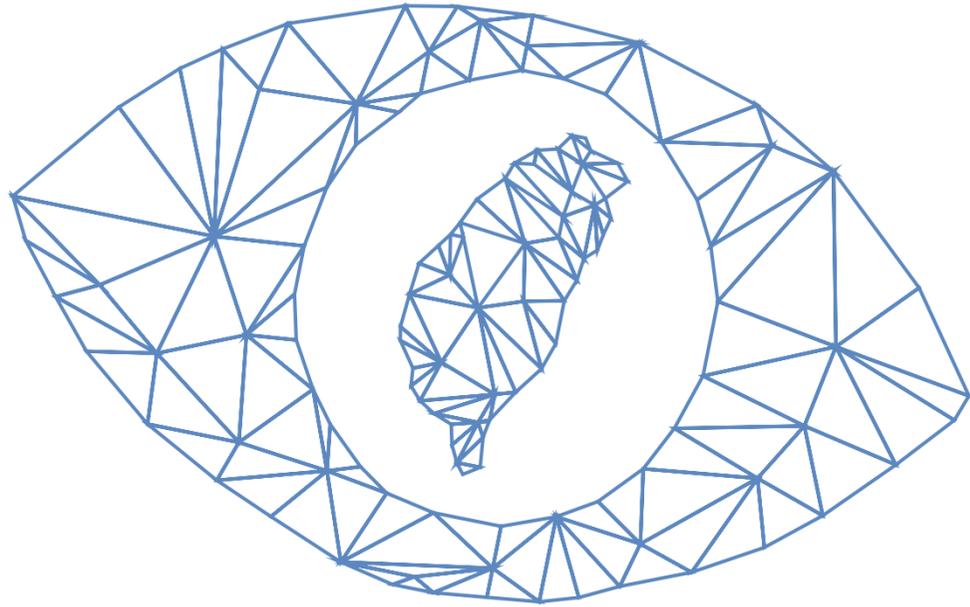
**i 郵箱** 取件超方便

據點超多 2,400 座

全年無休 日夜都可取

付款取貨 快速又便利

年報特刊



- 媒體勞動者？-僱傭/承攬（特約/自由撰稿/攝影...）
- 勞動基準法的基本概要及媒體勞動者的特性
- 職場霸凌/性騷擾？
- 職業安全與職業災害保險法新規定

## 記者勞動同樣有價！ 「受雇主監督指揮、約束時間」即享有勞工保障

### 陳曦 / 《卓越新聞電子報》特約記者

記者的工作型態相對特殊，但同樣應有勞權保障。由國際記者聯盟（IFJ）贊助、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主辦的「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系列講座，2021年12月11日舉辦「血汗不白流——你必須知道的媒體勞動權益」講座，邀請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擔任講師。

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在講座指出，許多記者與媒體機構之間的關係，可能是僱傭、承攬或特約，但實際上的認定，並非依據雇主或勞工的觀點，而是在於「雇主能否對勞工行使監督指揮權」，確認雙方存在從屬關係。

陳淑綸強調，當勞工權益受到侵害，「不要覺得是行業正常」，把不好的事情當成必然存在，只是讓工作環境變得更差。陳淑綸更提醒，「勞動是以時間拘束為核心的概念」，對

勞工時間的限制與拘束，包括要求待命、回覆LINE，都是工時，應給予加班費。

### 僱傭關係的實質認定

陳淑綸直指，在許多的調解案件中，申訴人往往以「我有勞健保」來印證自己是僱傭的勞工，但「這是典型誤認」，勞健保只能作為輔佐證據，也可能僅被視作資方提供的福利或協助，雇主和勞工之間，僱傭關係的存在須實質認定。確認僱傭關係，則勞工受勞基法保障，除應給予勞健保、勞退、加班應給予加班費外，雇主也不得任意解僱或不續聘。

陳淑綸說明，實質認定僱傭關係是否存在的核心在於，雇主能否對勞工行使指揮監督權？雙方是否存在「從屬關係」？

從屬關係的面向包括人格從屬、經濟從屬、組織從屬等，實際情況例如：勞工在特定時間內，是否只能為某一雇主服務？雇主委任的工作，

是否一定要由受委任的勞工來完成？勞工的主要生計是否依賴雇主提供的工資？勞工是否需要遵守雇主訂立的規範，像是打卡上下班、不在外面妨礙組織聲譽？

你是特約記者還是正職記者？

以媒體業來說，究竟記者是「僱傭制」還是「承攬制」或是「特約」，除是否有合約、具體合約內容外，也須看雙方是否協議有一定的供稿量、工作時間、或是依照拍攝的照片張數、製作的專題數量等來給薪。

而記者多種類的工作型態，在調解時又有更多細節需要進行認定。陳淑綸打比方，有打卡就能等同公司行使指揮監督嗎？記者在非工作時間能否供稿給其他媒體機構？工作合約裡有沒有競業禁止條款？有沒有禁止受僱勞工為第三方提供勞務？

### 從屬關係認定舉例

陳淑綸以外送員為例來解釋「從屬關係」的認定，外送行業初在台灣興起時，普遍被認為是承攬制，直到有外送員在工作時發生車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出面認定平台與外送員之間的關係是僱傭制，平台須負相關責任。認定的原因是外送員要穿Uber Eats或Foodpanda等平台的制服、禁止為其他同業服務，等於對單一平台有專屬性；此外，外送員也被規定不能穿拖鞋吃檳榔，以免影響平台形象，在排班時間不接單也會有懲罰，等於對外送員進行管理。

在勞動部做出認定之後，外送平台業者才隨之將相關規定作出改動，像是不規定穿制服，但

是穿制服就會多給5塊錢的「廣告費」，也不再禁止外送員同時為多家平台服務，合約中也會多次寫出「承攬」二字，想盡辦法避免再被判定為「僱傭」。

勞動是以「時間拘束」為核心的概念

陳淑綸補充，「勞動是以時間拘束為核心的概念」，勞工的時間被雇主所限制，而記者的工作型態又不同於一般的辦公室員工，其中電視台記者、網路媒體和平面媒體又有不同；以電視台記者來說，無論是休息時間、待命時間或是工作，都被要求要進公司，但是網媒和平面記者就不一定，「他出去跑新聞，（雇主）不知道什麼時間在寫、什麼時間在喝咖啡」。

因為記者在外採訪、寫稿的工作特質，曾經有某家知名報社率先制定「8+2」（8小時工作、2小時休息）的上下班時間，但長達十小時的時間引起不滿，勞動檢查員也僅認定較常見的「8+1」，其中雇主也必須能夠明確回答記者的休息時間如何分布。

陳淑綸提到，工作時間之外，「待命」又更討厭，「到底是不是工作？」這在相關法規上也沒有規定，雇主就延伸出各式各樣的公司規定，但按照勞動部解釋的話，只要勞工的時間、空間受到拘束，無法自由安排，就是在待命；但on call又不是，因為「沒call就沒事」，因此對勞工來說「on call最衰，失去一部分自由」，卻又往往無法拒絕on call。

勞動部有《勞工在事業場所外工作時間指導原則》，但在實際應用上經常出現尷尬情況，陳淑綸提醒應做工時紀錄，勞工按規定做記錄、雇主也要進行確認，「不是不打卡就沒有（出

勤紀錄)」。而受指示等待勞務的時間也應視作工時，若超出約定時段仍須等待，雇主同樣要支付延長工時的加班費。

至於加班費的相關規定，勞動部指導原則認為「我交付，你才加班」，但對勞工、尤其是在外工作時的情況來說，雇主無法確認工作是否結束，要由勞工回報、提報加班需求並徵求同意，此外現在經常有雇主在下班時間後仍用 LINE 傳訊給員工，新北市勞動局對此祭出一項辦法：「每回一則 LINE，就算 1 分鐘工時。」

#### 勞動契約應注意事項

在與雇主訂立契約時，也有許多應注意的事項和規範，像是口頭約定也是合議契約，不一定非要透過書面。

還有部分媒體、甚至包括公家背景的媒體所採行的「一年一聘」其實不符合勞基法，「我國勞基法只有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特約這四種定期契約」，其餘一律是簽未訂下結束期限的不定期契約，「一年一簽是習以為常的違法」。

若在實質認定程序上，要看勞工受僱執行的勞務範圍「是不是繼續性工作」；此外，有機構會採取「退休回聘」的方式，回聘的勞工改為特聘身份，但其實勞基法的強制退休年齡是基於對勞工的身心保障，無論任何理由退休，回聘之後「仍是勞工」，勞動本質沒有改變，應有的勞動權益也必受到保障。

陳淑綸補充，《勞動基準法》第 53 條規定的退休條件為：工作 15 年以上年滿 55 歲者、

工作 25 年以上者、工作 10 年以上年滿 60 歲者，該規定用意在於，如果勞工退休時未達上述要件之一，雇主可不支付退休金，但現在的年輕勞工不需要顧慮這點，因為新制已改為薪資 6% 每月撥入專戶，非由退休時的雇主支付。

#### 工資名目影響加保級距

依目前法規，5 人以下組成的小型媒體可以請工會為員工加保勞保和勞退；若是用公司名義加保，則勞保金額由雇主負擔 7 成、自付 2 成、國家負擔 1 成，工會加保的話，自付比例就提高到 6 成。

此外，勞工即使獲得勞保，也仍要注意是否「高薪低報」，陳淑綸說明，很多公司的薪水組成可能被拆成通勤津貼、膳食津貼等等名目，加保勞保和勞退時的「工資」僅只有薪水的一部分，但實際上「因工作所獲得的報酬就是工資」，《勞基法》第 2 條即規定，經常性獲得的工作性報酬，無論名目為何，即認定為工資。

舉例交通津貼，若是以住家到公司的距離劃分不同，就不視為工資，但若固定每月獲得固定金額，就是工資，例如由於夜間輪班而給予的「夜點費」，「不管它叫什麼，只看跟工作有沒有關係」。

陳淑綸補充，雇主往往想盡辦法利用不同名目爭議、任意解釋工資，最廣為人知的例子就是「客運司機工資名目之複雜」，另一個例子則是年終獎金，過去年終獎金曾不被視為工資，但若工作條件寫明「保障 13 個月」，即為工



講師陳淑綸（右）和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執行委員吳柏軒（左）。（攝影：陳曦）

資；有的雇主會發紅包來代替年終獎金，即是避過被視為經常性薪資，這些都會導致勞工未能獲得應有的勞保保障。

至於陳淑綸調解過最特殊的案例，則是直播主。直播主的打賞、點數是否可以換算成報酬收入？或是直播主和老闆之間算是僱傭關係嗎？也是因應不同的新工作型態而生的問題，也顯示法令經常跟不上新興行業。

陳淑綸提到，立法院在 2021 年 5 月 1 日通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將於 2022 年 5 月 1 日實施，屆時所有事業單位強制納保，臨時工也要保。把職災保險和勞保分開，職災保險的部分全由雇主支付，也可選擇只保職災保險，員工上班第一天即受保障，即使雇主還未加保，國家也會支付發生職災的勞工保險金，其後再向雇主討要，再次提高國家對勞工的保障。

《卓越新聞電子報》授權轉載  
<https://www.feja.org.tw/62750>

## 要保障還是彈性？ 記者工作型態多樣又特殊，勞動權益如何維護

陳曦 / 《卓越新聞電子報》特約記者

台灣的勞動意識仍有待提升，記者也不能忽視自己的勞動權益，媒體工會因此希望將記者勞權加進 NCC 審核電視台執照的項目之一，以此喚起主管機關和媒體老闆對記者勞權的重視。

由國際記者聯盟 (IFJ) 贊助、台灣新聞記者協會主辦的「台灣新聞自由與記者權益監測計畫」系列講座，2021 年 12 月 11 日舉辦「血汗不白流——你必須知道的媒體勞動權益」講座，台北市產業總工會總幹事陳淑綸指出，事實上記者因工作特殊性，許多時候勞權受到侵害卻難以反抗，例如採訪時可能遭遇危險、卻不能退避，而很多媒體雇主也經常沒有意識到採訪現場存在危險，或是事後記者的精神創傷需要協助。

此外，新時代的記者與媒體機構的關係更多樣，需要更多彈性，但法規保障和彈性難以兩全，需要勞工和雇主之間有足夠強大的共識，才有透過協商取得平衡的可能。

注重記者權益 從主管機關做起

陳淑綸表示，現在的媒體工會其中一個努力的方向，就是讓電視台主管機關——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 在發照審核時，認知到「勞權是重要的」，希望爭取在換發執照的評分表

裡列入勞權為固定項目。

對目前正在爭取上架的新聞台，NCC 委員也應關注董事會裡有無勞工董事？產生程序是否有足夠代表性？有無勞資會議的制度？相關工會盼望以此提升社會與政府對新聞工作者勞權的重視。

逼退勞工 雇主鑽法規漏洞

陳淑綸舉例《勞動基準法》法規，指出我國法律提供勞工最基本的保障，依據法規，雇主要開除勞工，實際上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因公司本身經營困難、或認定勞工能力不勝任而資遣勞工時必須付資遣費外，終止勞動契約也須檢視程序是否合法。

雇主往往也有很多讓勞工「知難而退」的手段，以記者為例，常見的就有職務調動，像是換線、換中心、調派駐地點、或是拿掉原本的主管職等，勞資雙方建立僱傭關係時若有簽勞動契約，當中的相關規定就很重要，例如僱傭如何開始、如何終止，合約內容也是進行調解時的重要依據。

陳淑綸提到，各縣市勞工局若收到檢舉，雖然在前往進行勞動檢查時，會設法去識別化來保護吹哨人，但保護往往不見得能夠全面，例如幾年前《勞基法》修法、立法院挑燈夜戰時，駐守立法院的記者只能半開玩笑地說，「違法超

時去找賴香伶（時任台北市勞工局長、現任台灣民眾黨立委）」，但事實上每家媒體機構裡，負責跑立法院的記者，「沒什麼好講、就是這些人」。

有無「退避權」？記者的職業安全

除了工作保障之外，台灣也以《職業安全衛生法》作為提供受到工傷的勞工失能給付、死亡給付的依據，如果勞工執行職務時出事、無法繼續工作，雇主有責任給付全薪，直到醫療終止，且採「無過失主義」，不論勞工發生工傷意外時本身有無過失，都享有職災補償，除非論及「賠償」，才會討論勞工是否有過失。

而討論記者的職業安全，就牽連到一個問題：記者有沒有「退避權」？

陳淑綸舉例 2019 年的香港反送中運動，有許多台灣媒體派記者前往香港採訪，但媒體主管卻覺得不需要戰前訓練和安全裝備，所以觀眾會看到其他國家的記者有頭盔、有防毒面具，台灣的記者卻只在身上用 A4 紙貼著「PRESS」字樣。

陳淑綸指出，「因應風險，雇主應該要做風險評估，在風險下要給怎樣的配備和支援？有無員工撤離現場的計畫？」這些都是雇主應該要想到的，然而事實是記者們準備不足，卻一瞬間變成戰地記者，回國之後精神受創，到了要看心理諮商的地步，此時雇主也應該意識到必須提供協助。

或是像 2017 年的反年改，就有記者被抗議團體毆打受傷，陳淑綸指出，當時應該有預謀要對記者動手，這種情況記者應該有權拒絕採

訪，因為對方不想被採訪、採訪行為可能觸發或強化攻擊，另外被打的記者，雇主要不要提供法律協助、以及賠償損壞設備？同業公會當時有發出聲明，但是否協助請律師就要看各家媒體不同。

要保障還是彈性？



2022 年將上路的《職災保險法》為勞工提供更完整的保障。（攝影：陳曦）

另一方面，在當今的媒體業，有越來越多的新聞工作者和媒體機構之間，已經不是傳統的僱傭關係，也就無法受到體制內《勞基法》的保障，但陳淑綸問，「進來（體制）就保障了嗎？」指出很多獨立記者「還是想要工作自由度」，事實上在修法和倡議時，工會也會思考「框架會不會太嚴格？」

陳淑綸舉例，2021 年勞動部開放電影從業人員適用《勞基法》第 84-1 條，也就是「責任制」，由勞工和雇主「自行約定工時與休息」，當時工會在協商討論時也非常掙扎，因為「大家都知道電影工作者血汗沒日沒夜」，要配合場地時間、天氣、拍攝畫面需求（清晨或黃昏）、演員檔期等等必然的製作壓力，放寬第

84-1 條的責任制，是否就意味著現場工作人員要完全配合、無上限的機動配合？

勞工未認知自己的權益

陳淑綸表示，「拍電影就很多浪費時間的事情」，如果事先沒有好的規劃協調，往往會有很多時間花在等待，「但這些不算工時嗎？」如果算進工時，那想必工時會非常的長。但若同意採責任制，從業人員就沒有加班費，工時上限也可以超過每日 12 個小時、每月 240 個小時的法規上限，限制放寬了卻沒有得到相應的報酬增加。

「但勞工來反應時，他根本不知道法律怎麼保護他」，還以為自己的工作性質不適用《勞基法》，開放第 84-1 條是「無法進入有法」，但實際情況是「從法內走到法邊邊，快被踢出去」，無奈電影業界勞資雙方對現行法的遊戲

規則從未遵守過，現在只得在強大壓力下開放適用責任制。

從這個例子也看出，法規的限制與不同工作類型需要的彈性，兩者間存在矛盾。陳淑綸表示，其實美國沒有《勞基法》，全世界只有台灣、日本和韓國有。其他國家都是最低程度的規管，例如德國。雖有相關保障勞工的做法，例如訂出工時上限，但數字往往很高，像是歐盟的工時上限是每週 48 小時。

不過這些規定都不是以法律規範，而是產業跟雇主做的團體協約、行業規定，台灣的作法則是對勞動者予以明文規定，勞動者想要的彈性在法規裡沒有、需要的保護，因為不在法規裡，就保護不到。如果法律要鬆綁，鬆綁之後會比較好嗎？鬆綁之前，勞工與雇主團體有沒有共同促進產業更好的共識？如果沒有共識，立法者必然不敢放手。

《卓越新聞電子報》授權轉載  
<https://www.feja.org.tw/62759>

## 要保障還是彈性？ 記者工作型態多樣又特殊，勞動權益如何維護

陳洧農 / 《卓越新聞電子報》特約記者

曾經一度在台灣發展鼎盛，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報導文學」，為何倏忽沒落、乏人問津？又是在什麼樣的契機之下，重新回到公眾視野？台灣新聞記者協會舉辦「新住民媒體識讀講座」，邀請到《鏡文學》副總編輯，同時也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常務委員的李志德主講，介紹「非虛構寫作」的歷史源流、興衰起落、寫作態度以及「讓受訪者吐露真心」的採訪策略。

以「非虛構寫作」為起點 帶動更好的媒體環境

李志德表示，時下社會大眾對於媒體的負面觀感固然有各種不同成因，但其中的確有許多部份是媒體工作者需要負起責任的。「媒體工作者必須去思考、去尋找現代閱聽大眾對於媒體有什麼樣的期待。」

2015 年在兩岸三地都同時興起了網路創業潮，媒體也不例外，許多「網路原生媒體」於焉誕生，而根據李志德這六、七年的觀察，長篇的專題報導，可能是這個時代的新聞工作者所能夠提供較好的新聞服務。

他說，大眾對於短新聞、即時新聞的需求很多時候已經被直播或專做短新聞服務的機構所取代，例如社群媒體的 App 也能夠做即時的訊

李志德說，2019 年他在香港報導抗議活動，真的有強烈的「記錄歷史」的感覺。圖：截取自線上會議



息推播，亦即這種最初階新聞發佈，已經不需要媒體也能做到。媒體人必須慢慢探索自身在新時代的存在價值。

因此，他認為以「非虛構寫作」作為媒體識讀系列講座的開場是件好事，「這樣的產品（非虛構寫作）做得越多、越好，大家越願意支持的話，我們就越能夠拉動新聞機構製作更好的新聞服務。」

什麼是「非虛構寫作」？

李志德介紹，非虛構寫作（non-fiction）作為專有名詞，大致上從 1995 年美國奧勒岡大學所開設的課程「創造性非虛構寫作」（Creative nonfiction）開始，此後成為一個廣為接受的

概念。

有人會問，非虛構寫作不就是以前的報導文學嗎？若要在概念上細分，「純新聞」(straight news) 強調客觀準確的事件描述，不需要細節，是相對單純的資訊傳遞，以所謂的「5W1H 原則」為人所知。1920 到 60 年代，「新新聞寫作」(New Journalism) 在美國興起，開始強調場景、敘事，希望有更生動的寫作，進而讓閱讀新聞不只是接收資訊，而能成為一種美感體驗。「報導文學」(在中國稱「報告文學」) 則是「新新聞寫作」到了華文世界的發展演變，大約在 1960 到 70 年代，台灣和中國都有大量作品。

李志德說明，非虛構寫作和報導文學有非常相近的外表與追求，希望把故事寫深、寫得具可看性，並且有限度地利用文學手法讓故事能夠說得清楚。

從資訊攝取型態的轉變 看報導文學的式微  
報導文學在台灣民主化初期，亦即 60 到 80 年代間發展到巔峰，陳映真的《人間雜誌》就是代表性的刊物，其題材特別關注社會的弱勢，如：原住民、勞工、失業者、失學青少年、未婚媽媽等。然而到了 80 年代末期，報導文學開始式微，以致於 2000 年以降，報導文學在台灣傳承已經很微弱。

李志德認為，原因之一是媒體的開放與競爭使得媒體機構的利潤變薄；而不論是報紙或電視，長篇報導都是高成本的產品，需要好的利潤才能支撐。90 年代之後媒體利潤越發變薄，也因此媒體越來越不願意生產長篇報導。

第二個更加重要的原因是網際網路的興起。他

說，當媒體開始把新聞材料搬到網路上，人們開始對網路上的新聞有新的想像：要盡可能簡短。因為現代人已經不像以前一樣，會買一份報紙好整以暇地泡壺茶慢慢看，通常是在路上等紅燈或在公車、捷運上匆忙地在手機上瀏覽。

此外，現代人往往在手機裡同時安裝許多新聞 APP，當有事件發生，許多媒體都會競相推播，「因為要比快，同樣的東西誰來得最快，就最有機會被點開來看，被點開來看才有廣告收益。於是所有的記者都被這樣要求：寫得快，而且要寫得短。在這兩個要求之下，漸漸地新聞內容就變得越來越輕薄短小。」

非虛構寫作重獲關注

對於新聞「快與短」的要求直至今日依然，「這就是生態，它再怎麼樣摧殘新聞業，都得低著頭承認，我們面對的生態就是這樣，沒什麼好抱怨。」李志德說。然而，網際網路同時有著另一個潛力：容量無限。以往長篇報導放到報紙上，最多給它兩個版面一萬字就到極限了，「但是網際網路是一個你只要願意滑，就可以無窮盡地滑下去的地方，」因此有人開始發現網際網路或許特別適合寫長篇故事。

2015 年前後開始有人嘗試在網路刊載深度報導，例如中國的《介面新聞》、香港的《端傳媒》，在台灣則有《報導者》和從傳統媒體轉型的《天下雜誌》，《聯合報》的數位訂閱也提供長篇報導專門的區塊。這樣的產品開始出現後，「非虛構」才重新被人們關注，並作為兩岸三地統一的名稱。

常見的非虛構寫作題材

非虛構寫作的題材涵蓋範圍非常廣泛，包括：人物、歷史、戰爭、社會案件、地理、環境、旅行探索乃至當代寓言等。李志德指出，人物特寫與傳記在非虛構寫作中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因為人們對於不認識的人物總是特別好奇，也特別愛看人的故事。

近代歷史是非虛構寫作當中特別有趣的主题，因為經常以 20、30 年前的事件為題材，有時候當事人都還在世，事過境遷再去採訪，受訪者的警戒心也不會那麼高，可以將來龍去脈娓娓道來。

至於記者如何判斷受訪者所說的內容可信度，李志德以自己最近在看的《噬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求生》為例，其內容講述西藏的阿壩地區自「紅軍長征」開始直到現代的歷史。書中的其中一位受訪者是位於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工作人員貢寶措，同時也是美賴王國（1949 年以前的阿壩地區）的末代公主。她講述了小時候的宮廷生活，以及後來經歷中國文革與政治批鬥，最後輾轉到了印度的過程。

李志德表示，嚴謹的採訪會進行周邊材料的確認，譬如貢寶措講到哪一年在成都，發生什麼事，情況如何等等，都要盡可能找到事發時也在當地的人確認，如果說法一致，那就大致可以相信其內容在相當程度上屬實。而像是宮廷生活這類難以求證的部分，只能從相關的文獻或研究中提及的情況進行對照。

李志德指出，有時候這些書面材料還可以對受訪者起到提示作用，因為人的記憶有限，但是當受到某些相關材料的刺激，可能就會喚起原

本不記得的回憶，也是一種採訪技巧。

既然名為「非虛構寫作」，內容的真實性自然是至關緊要，李志德認為，不只作者，新聞機構與出版社都應該對訪問內容進行第二輪乃至第三輪的查證。

媒體的可信度

有參與者提到，自己曾擔任人物採訪的工作，稿子交回去之後卻被改得面目全非，因此後來對於人物傳記或採訪的內容，心中都會抱以質疑。做為讀者，該如何分辨非虛構寫作內容的可信度？

李志德表示，記者寫的東西被亂改，這種事情的確可能發生，特別是編輯部專業能力不足，或是抱有特定立場的時候。那要如何找到可信的報導？他認為，還是要靠經年累月的觀察，來辨識媒體的可信度。

「一個媒體值不值得相信，不是在於它會不會犯錯——所有媒體都會犯錯——而是在於犯錯之後它怎麼面對。」他說，西方著名媒體也會爆出弊案，譬如得了普立茲獎的作品是抄襲的，或是某個重磅調查報導的內容是虛構的，甚至連採訪對象都是虛構的。在這種情況下，好的媒體會去面對，會自我揭露，並且鄭重地向讀者交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未來如何改善。

記者的心理壓力

有人提到，在如今資訊攝取模式轉往移動端之後，媒體與記者能夠更即時得知閱聽眾的回饋；相對的，也較以往承受更大的心理壓力。

新聞工作者是否有心理輔導的協助或相關資源？

李志德指出，台灣的媒體機構較少意識到記者的心理壓力問題，因此也缺乏相關資源，但是這類問題與需求確實存在。以每天下午兩點的疾管署記者會為例，其內容都會在 Youtube 直播，在留言中經常可看到記者遭受批評甚至辱罵。「很多時候其實記者工作的全貌並沒有被看見。」當記者不斷追問一個問題時，很可能是因為他從前一天甚至更早之前就開始問這個問題，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回應。「因為直播的關係，記者隨時會看到別人對他的批評，是這個時代非常大的壓力。」

另一個壓力的來源是採訪環境的改變。在以往，政府部門的記者會是不公開的，現場只有記者跟官員。對記者而言，提問得不到結果或是不滿意的話，他可以繼續問，到最後寫出成品或者是電視播出後大家才會看到，也因此能比較安心地進行工作。

而現在將採訪過程公開的做法，對官員來說，在他與記者溝通的同時，其實也在跟全國觀眾溝通。李志德說：「一個官員如果意識到，自己可以直接向所有國民表達訴求，有時候記者的追問，特別是那些讓他覺得很尷尬的追問，他好像就可以不用理了。」而這是現在新聞現場的常態，也造成記者極大的壓力。

非虛構寫作的姿態

李志德帶領參與者們一同賞析許多非虛構寫作的精采文本，其中由《報導者》撰寫的《廢墟少年：被遺忘的高風險家庭孩子們》講述失學、逃家等與社會主流價值格格不入的少年們，值得注意的是：記者們讓自己和受訪者保持在同

樣的高度，去了解並同理其生活，而不是站在高高在上的位置去俯視他們，或給予生活上的指導、批評。李志德認為，這樣的態度，正是非虛構寫作者應該保持的姿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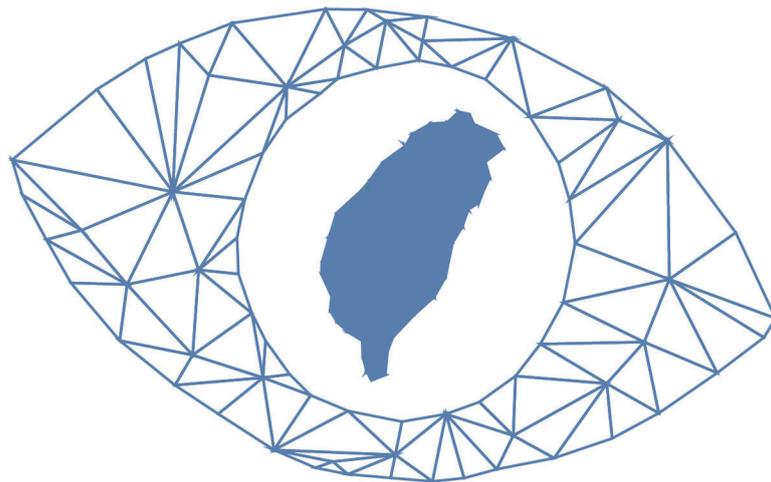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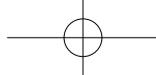
有參與者感到好奇，採訪時，如何讓對方願意和自己說真心話？是不是有「咄咄逼人」或「戳他一下」的採訪策略？

「我真心覺得很多在電視劇上面看到的記者形象都是錯的，」李志德笑道：「記者更多時候是一個要不斷去同理別人的過程，所以一個好的記者很少，幾乎沒有在面對採訪對象的時候是『我比你高一等』、『我來教訓你』、『質問你』的形象。」

李志德指出，除了在面對官員，或是有權力者的場合可能會是例外，否則記者面對採訪對象的基本態度都是傾聽與同理。「哪怕坐在你面前的是一個殺人放火的江洋大盜，你都是先問他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感想，然後他的事情。什麼時候會需要去刺激他或戳他一下？的確會有，因為你不能變成他的傳聲筒，但是一定是在你把他所有的事情都聽完了，或是聽到了一個你有把握去質問他的時候，才很謹慎地丟出你的質問。」

李志德認為，在真正的採訪現場，不管是就技巧、倫理，或是寫作的周旋程度來說，一個記者的姿態都應該是蹲得很低的。「別人為什麼願意聽你的問題？因為你是坐在他面前，真心想了解他在想什麼。」他說：「這既是記者採訪的技巧，其實也是人性。」

《卓越新聞電子報》授權轉載  
<https://www.feja.org.tw/62459>



# 2021 台灣新聞自由年報



台灣新聞記者協會  
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